



西安地方志

2013·第3期

(总第222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我们的村落

- 祭台村 祭台社区居委会 (3)
 仁厚庄 仁厚社区居委会 (7)
 与木塔寨为邻 段路晨 (8)

历代名人与西安

- 傅介子——汉代出使西域的著名使者
 (11)

学术交流

- 《清麓丛书》的编者和版本 王 翰 (13)

人物春秋

- 西汉名臣张安世 宋亚颖 (15)

史料钩沉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0)
 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意欲何为 (22)
 党史上的三次危机与转机 (26)
 朝韩八条热线如何“全军覆没” (28)
 乾隆初年英国商人如何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
 (30)

西安风情

-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三)——兴安门
 (32)
 西安曲江新区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渭旗锣鼓 富小云(整理) (34)

文史拾趣

- 清末考生有多苦 (35)

毛泽东读书时哪一门课成绩只得 40 分	(36)
领导人国外演讲有“门道”	(38)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40)
揭开古代女子肚兜的秘密	(42)
中国最早四位女留学生的故事(三)	(43)
志鉴动态	
省地方志办主任张仁华到市地方志办调研	(46)
《雁塔区志》通过复审	(46)
市地方志办公室以推进区县二轮修志工作为抓手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47)
知识窗	
“株连九族”指哪九族	(48)
“囊中羞涩”是一种善举	(48)
“五雷轰顶”的“五雷”是指什么?	(49)
“孔方兄”称谓的来历	(50)
“筷子”称谓的起源	(51)
“楚河汉界”指的是什么地方	(52)
“飞黄腾达”的“飞黄”指的是什么	(53)
日本和服的起源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少年游》	(宋)柳 永 (55)
解字	
“半”	(12)
“内”	(45)
名句欣赏	
【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等五句	(56)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祭台村

位于南二环太乙路立交桥四周,横跨西延路。2010年,1043户,2118人(其中城市居民176户,240人),土地面积17.8837公顷,折合268.26亩。下设四个村民小组。

该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汉代即见于文献记载;据该村出土的北魏《邑子二十四人造像碑》、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44年)《邑

子二十七人造像记碑》,北魏时为羌村(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西安通览》)。

今名得于唐初。据传:一说唐高宗李治为便于遥祭昭陵,在长安城的东南角特设祭台,于每年祭祀之日,在此追念其父李世民,因而得名祭台村。二说唐初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因这里地势高耸,在大臣魏征的建议下曾在

●我们的村落●

此设台遥祭昭陵。杜牧诗“乐游原上望昭陵”即印证此事,借此村民取祭台为村名。三说唐太宗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活捉单雄信,在这里命敬德斩杀,秦琼催粮归来后得知,在此设祭台祭祀,而得名祭台村。

地处于唐长安城的“安邑坊”、“宣平坊”和“升平坊”三大坊区。唐太平公主又在此添造亭阁,使祭台至青龙寺一线成为以岗原为特点的自然风景游览区。

唐玄宗时这里已扩大成为长安城区,“安邑坊”坊址在今西安南郊友谊东路至祭台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东至刘家庄之间。考古实测坊南北长 400 米,东西长 1032 米。四面各开一门,坊中有十字大街,坊内建有寺、观,庙宇及当朝司徒、大将军、户部尚书等十多处官宅。至唐末战乱,唐室东迁之后,长安城急剧颓败,坊区胜景不复存在。这里的建筑悉数尽毁,至北宋宋哲宗年间这里终成一片农田,当年迁出的先民后代,又回到祭台村繁衍生息,延续至今。

该村原以梁姓为主,此外还有王、夏、彪、高、姚、陈、叶等姓氏。解放前后有刘、吴、浦、靳、秦等姓氏村民陆续迁入,梁姓村民解放初占全村总人口的 80%。梁姓分为四支,其中以“大门楼”(因其院门楼高大,村里人称“大门楼”)梁家,户最大,人口最多,占当时全村总人口的 50%左右。大门楼梁家当时宅院大,房间众多,门前有专门停车马、轿子的场地,村



改造后的祭台村

边有梁家坟地,上房有梁家祠堂,供奉有祖宗牌位、梁氏族谱(在文革期间已毁),据上房长孙梁鹏(71 岁)回忆,梁家先祖在清初时任嘉峪关督军,嘉峪关瓮城内有碑石记载,清乾隆初年死在边关,骨灰运回后葬于梁家祖坟;清乾隆 3 年进行分家,其中一房去南方经商,杳无音讯。

解放前后,土地面积 1500 亩以上,遍布在雁塔路以东、经九路以西、乐游园以北、友谊路以南及其周边。村民的住宅主要集中在现在的南二环及二环以北至现在的老村范围,有人口 48 户,450 人,以种植粮棉为主。大部分家中有手工豆腐磨房,或挑担子、或套马车外出卖豆腐;有数户人家在城里面有字号,以经商为主;有赶马车、跑卡车(梁富庆)的运输户,村中还有掏井、泥瓦、盘灶等工匠;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说明当时祭台村民经济情况的一句话:“四大家(有钱人),八小家(富足),二十四个银活(音,日子过的可以)家”;当时村

北有石佛寺,村西有岳王庙、涝池,村东南有南坡(今乐游园,汉宣帝在今大雁塔处,开辟皇家乐游苑并建有乐游寺,其所在古原便得名乐游原),一片田园风光。

20世纪60年代初,改为种植蔬菜为主,有耕地近千亩。20世纪80年代,有耕地569亩。随着耕地的减少,村民逐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加盖房屋,房租收入和其他收入并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房租收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本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变化不大。

多年来,已将原有100公顷(1,500亩)土地中的85公顷(1,300亩)贡献给国家,用于市政建设和企事业单位的发展。

1993年修建南二环路,拆迁一、二、四组村民130余户,400余人。这部分村民按组被重新划拨宅基地,安置在二环路南、西延路两侧,分别形成一组、二组、四组新村。

2003年初被西安市人民政府,列为西安市首批十四个城中村改造村的重点村。当年五月完成整村规划、整体改造方案,并报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成为西安市首个完成整村规划、整体改造方案的城中村。

2004年9月,西安市重点建设项目,贯通太乙路、连接南二环,修建南二环太乙路立交桥工程开工建设,拆迁村民院落244座,拆迁人口422户,700余人。

2007年6月,祭台三组与碑林区市场中心合作曼城国际项目,拆除村民院落20余座,拆迁村民50余户、100余人。

2007年9月,路桥建设拆迁村民的安置楼,在太乙路南口以北,建设东路以南、建筑

科技大学东邻13.13亩的土地上竣工,10月开始陆续安置拆迁村民。

2008年12月祭台社区居委会挂牌成立。

2009年5月,祭台村城中村改造整村拆迁工作完成。

该村股份制改造工作,结合改造拆迁,目前已完成清产核资、资产量化工作。完善手续、发放权证等工作正在积极筹备和准备,将在碑林区城改办安排、指导下,逐步完成。

该村村北有寺庙,名定光佛寺,因地震、战乱等,寺名累建累改。元代在原址建石佛寺,有古石佛背刻“西魏大统甲子造像记”。后寺毁(西安西城门文史馆档案记载)。

石佛寺原址在现村东北角(现为西安市碑林区祭台村小学),寺庙偏殿在抗战时期由于军队修水利缺乏木料拆毁。1955年庙中石像、泥塑佛像迁至大雁塔寺庙之中。1956年被误认作青龙寺,经常有日本人前来探询。剩余佛殿建筑于1978年至1980年时拆除,庙门外有石像生卧马一对,已毁。1993年3月,由村中信仰佛教诸人集资修建于村东南、乐游园之顶,自佛开光后,香火不断,四时八节由各方居士前来寺庙拜福。犹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视为石佛寺之正日,当地称为“散干会”,届时周边人众,数以万计赶赴庙会。该寺于2009年5月因改造拆迁迁至长安区。

民国初年(1920年左右)村中即有社火活动;发起与组织人为梁宗信、梁天林、叶敬轩等。农闲排练,大年初五以后在本村与邻村演出,多以历史人物、戏剧故事为题材,演出人员众多,常常是一百余人,旱船、走马腰鼓、小

●我们的村落●

丑剧、高跷等轮番出场。祭台村的社火高跷在城南最为有名。

1940年左右,祭台村村民成立秦腔剧社,主要人员由张明信、陈维新、陈焕新、梁春乾、张志义、梁培禄、梁有钱等人,戏装、道具、锣鼓、乐器齐全,解放前在本村及南郊各村搭台演出;1956—1964年经常在铁路局俱乐部、建筑科技大学俱乐部、音乐学院俱乐部演出。

梁维翰(1900—1981),西安名医,擅长肝病、白血病、精神疾病治疗。1931年至1935年在本村办私塾五年,启蒙教育本村、邻村子弟,仍在世的祭台村八十岁以上老者曾有一百人受教,至今仍尊称其梁先生。1930年起行医至1955年的20多年里,对本村及附近乡亲医病从不收取脉金,遇贫困患者购药赠送,十里八村乡亲,赠颂扬牌匾多达31块。1956年在西安东关发起成立公私合营中医医院,任副院长、门诊部主任。曾应邀为习仲勋,赵伯平等领导人医病。1962年应邀赴京参加全国中医学术研讨会受周恩来总理接见。1957—1965年曾多次当选西安市医疗系统先进工作者,担任过碑林区和西安市政协委员。

西安城南著名的脸谱画师和泥塑艺人梁宗信(1882—1964)、梁天林(1893—1961),人称“祭台画匠”。参加过西安市慈恩寺、兴善寺、东岳庙、八仙庵、城隍庙、曲江寒窑、蓝田县水陆庵、长安区华严寺、香积寺的彩绘、塑造、修补。解放前的大雁塔庙会、梁家街庙会、长安王区庙会的民间社火演出,其主要演员的脸谱均由梁宗信老人勾画。

著名民间木偶戏艺人梁向前,16岁开始

学习木偶戏,因其生动逼真、妙趣横生的精彩表演,获得诸多好评。在近60年的木偶戏生涯中,木偶戏已成其精神支柱。退休后经常在环城公园表演《白蛇传·断桥》《三国·刘备祭灵》等传统的陕西木偶戏,为过往市民展现流传西安一千多年历史濒临失传的陕西民间木偶戏。

祭台村有两样堪称凡间妙活的东西,一样是村里的豆腐,一样是村里的车把式。西安府咸宁、长安二县的百姓,差不多都吃得是祭台村的豆腐,都说祭台村的水好,磨出来的豆腐没有豆腥气,村里家家户户都吊得起豆腐包,还都会做香干。香干就是豆腐干,在清朝时期,祭台村的香干远近闻名,城里的人都说“祭台村的香干顶风能香出十里地。西安府东、西马号里不论早晚都拴有祭台村的骡马大车,城里的字号人家对村里的车把式喜欢不过,不论长脚还是短活,讲究要喊祭台村的车把式吆车。”

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是祭台村的“会”。当日,凡是祭台村的亲戚、好友,以及邻村的乡党都要来凑热闹,周围的小商、小贩,卖各种小吃的,捏泥人、做糖人的,挑担子理发的,卖蔬菜水果,彼此云集。材火行道(爱好武术)的凑在一起,还要拉开场子,相互表演,交流一番。各家各户的主人们,也是忙前忙后地招待客人,把准备的好吃的、好喝的都拿出来,与客人们痛快的叙旧。遇上好的年景,村上还组织村民打台子唱戏,到了晚上还要放花(烟花),把“过会”活动推向高潮。

(祭台社区居委会)



仁厚庄

位于东关南街街道办事处地区的东南角,南到咸宁路,北至仁厚庄北路,东达东二环,西与仁厚庄一社区接壤,面积约 0.12 平方公里,1012 户,2825 人。

据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讲,仁厚庄建庄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清康熙年间,山西有位姓亢的生意人到这里落脚建庄。并取庄名“亢家堡”。因此人为人忠诚厚道,乐善好施。所以,四面八方的人都陆续搬来这里居住。抗战胜利后恰逢“二月二、龙抬头”庙会,大家为了庆祝胜利的喜悦专门制作了一面庄旗,旗上写着“距城二里仁厚庄”。从此“亢家堡”就被大家叫做了“仁厚庄”,此名一直被沿用至今。

1954 年土地改革后,仁厚庄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当年的村委会主任樊海龙,在无人力、财力支持的情况下,发动村民自筹资金并带领大家历时三年,将只有一条过廊,前三间后一间占地不足一亩的破旧庙宇,分两次改建成了占地两亩半的校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村民思想封闭和观念守旧,发展空间受到制约,满足温饱成了当务之急。1980 年 12 月仁厚庄的村民由农业户口全部转为城镇

居民户口,成为碑林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村民们不等、不靠,在外打工、自主创业,用挣来的钱修建自家的房屋并将多余的房间出租。1980 至 1990 年,仁厚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6500 元。

2000 年 10 月仁厚庄社区正式成立,由原仁厚庄社区居委会、市平绒厂家委会、林业部规划价位会组成,驻社区单位 3 个,1 所小学。先后荣获“市级示范社区”、“先进劳动保障工作站”、“促进就业示范社区”等光荣称号。

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中村改造工程也迫在眉睫。但仁厚庄的居民提起“拆迁改造”,可以用“谈迁色变”来形容这段痛苦的往事。有着两次拆迁改造的经历。两次都因为开发商的中途撤离而夭折了,留给仁厚庄的是拆了一半的家园。搬走的人因得不到拆迁补偿款又搬了回来。

2008 年 6 月 13 日,碑林区动迁组正式进入仁厚庄。由于前两次不成功的拆迁给居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居民的抵触心理难以想像。有的居民叫门就是不应,有的干脆不回家躲着,和拆迁人员玩起了“捉迷藏”。经过多方努力,2008 年 9 月中旬仁厚庄拆迁工作圆满完成。仁厚庄区域成为一个集居住、商务和商业三大功能于一体的都市综合体。

一座村庄的消失,不需要太多的注释与记录,如果有,也只是在一群人的记忆中。同样,一座城市的兴起,也是在一群人的记忆中,只不过维系城市记忆的方式往往要依靠发黄纸页上墨色的文字。村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洋溢着时代气息、崭新靓丽的楼群。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历史!

(仁厚社区居委会)



图为作者在改造中的木塔寨村前

与木塔寨为邻

◎ 段路晨

木塔寨是隋唐木塔寺遗址的所在之处。隋文帝开皇二年在大兴城西南角的禅定寺修建了一座高三百三十尺的木塔，与相邻大总持寺中的木塔高度相当而形成双塔，由此命名木塔寺，所处的寨子取名木塔寨。木塔寺一度是全国最辉煌巨大的寺院，在中国佛教史上拥有重要地位。历经唐末战乱、宋元重建、元末浩劫，屹立了七八百年的木塔最终焚毁。如今的木塔寨位于西安市高新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城中村。与很多商业繁华的城中村不同，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外来底层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

寨子南边、东边的出口都有题名“木塔寨”的牌楼，很古朴，透着被历史浸润的沧桑感。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相比，这些低

矮的建筑与大环境格格不入，亦如在都市快节奏中生活的农民工一样。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有企业工作，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与木塔寨毗邻。每天上下班，都会与这些农民工相遇。一样在天刚亮的时候出发去工作，天黑的时候回到住所，冬天用“披星戴月”形容也不为过。等车的时候，他们会上下打量着我，我也会同样观望着他们。衣着款式、发型配饰、面容气质，无不透出异乡打工者的感觉。他们总是三五成群，高声谈论着见闻琐事，完全不避讳旁人。总有工头在上车前大声告诫道：“我只负责把你们带去，干好干不好，人家看上不上，把谁辞了不要来找我！”

我又何尝不是和他们一样，同是离开家

在大城市独自打拼的打工者。只是文化背景和工作性质的不同,让我能够与他们明显区别开来,但又同样寄生于这个陌生的城市,整日为立身的目标奔走忙碌,日复一日,早出晚归。

虽然离木塔寨很近,我却很少进去,偶尔求近和同屋的王姐去木塔寨吃饭。寨子外面常有摆地摊卖旧衣物和卖膏药的,道路两旁都是小商铺,超市、饭馆、水果摊、菜市场、服装店、鞋店等等一应俱全。与日益增长的物价相比,那的东西很便宜,有的甚至低于城中价钱的一半,量大份足,但是卫生条件差些。王姐安慰我:“其实餐饮行业都一样,装修好的其实也就外面看着干净。”我们去过的饭馆只有几家,还是选择相对干净的门面。至于木塔寨究竟有多大,依然无从知晓。

主干路上常有乞讨者,这些人没有编出在商业街乞讨的同行们催人泪下的故事,而是靠吹拉弹唱的手艺挣钱。夏日晚间的木塔寨更像是农村的集会,忙碌一天的农民工们回到这里,把原本不宽的道路挤得紧紧实实。我们走在里面,穿着气质同寨子的人们大不相同,我拉着王姐,生怕走散。

我们聊到这些乞讨者为何会来木塔寨,住在这里的人又没什么钱。王姐说:“谁说的,他们工资是日结的,一天上百块呢,比咱们有钱多了。”我想,这些乞讨者来这,或许更看重他们的同情心。

有人在微博上晒出了农民工的工资单,月薪少则 5000,多则上万。很多人发出后悔当年好好学习,没能当农民工的感慨。可是,谁

又能受得了每日繁重的体力活和随时担心着落的生活呢?

木塔寨的所有店铺都没有卖牛奶的,有的只是一元一包的酸酸乳。清早的公交车上,我见过个别人只拿着一袋酸酸乳喝,权当作早餐。我多想告诉他,这奶饮料根本没什么营养,早上喝还会引起胃酸,反而不好。但我没法开口。

因为和他们作息一致,公交车常常因为成群结队一拥而上的他们变得特别拥挤。一次上班途中,我临近的座位上有人要下车,我侧身让路,一个民工凑了上去,原以为他是要和我抢座的。可是没有,他笑着对我说:“你坐!”坐了没几站我下车,特意叫他来坐。瞬间一个中年女人迫不及待地抢了座位。我有点不舒服,他却朴实地笑着。40 来岁的他脸上满是沟壑,墨绿色衣服的肩膀磨得泛白,一根长榔头在手里杵着。

下班碰到回家的民工,我从不和他们抢座位,希望他们坐着,因为这些人比我累得多,或者正饿着肚子回木塔寨,只为那顿便宜于市价的饱餐。

工作生活中,我常常因为事与愿违而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感与离家打拼的孤独感、前途未知的躁动感杂糅起来,便会不自主地陷入无比低落的情绪之中。可是,公交车上说说笑笑的农民工们仿佛每天都很开心,干着粗活累活却依然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昂扬的气氛总会感染到我,并由此感到惭愧,也心生疑问。

难道他们没有挫败的时候吗? 什么力量

●我们的村落●

支撑着他们起早贪黑、勤俭节约地努力工作？也许是凭手艺换来相对高额的犒赏，是一家老小过上好日子的期待，是走出乡村、立足大城市的憧憬与希望。而我，不也正努力打拼，依靠自己的力量融入这座城市，只为打造自己的一方天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让父母退休后得以在这个硬件设施齐全的都市中安享晚年。每每相遇，他们无形中提醒着我学会坚忍地面对生活，我也越发敬重起这些用力气谋生的农民工们。

时光将一切洗刷得平淡，这些不知具体姓名的群体早已在不经意间融进了我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农民工相处的日子里，我从害怕、躲避、理解、敬重而渐渐地习以为常。当木塔寨地区综合改造项目成为西安市综合改造重点项目时，没想到这一举措同我联系多么紧密。直至发现上下班的公交车厢里比以往空了很多，渐渐不见他们成群结队、大声吆喝上车的身影，我才猛然意识到，那些无数次提醒我乐观面对生活，陪我一起在上下班高峰期挤车的同伴们离开了。

只是一个秋天的光景，昔日晚间嘈杂热闹の木塔寨安静得只剩下回音，木塔寨真的要拆迁了。从牌楼外一眼望去，能望到笔直的大路通向内部上千米的距离。我才知道，这寨子原来这么深！

怀念在自家门口摆摊修鞋的妇人，身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夹衣，双手粗大却针脚密实，任凭多破旧的鞋都愿意修补，我还记得她时不时抬起头微笑地看着抱在女儿怀中的外孙，脸上透出的慈

祥神情。怀念那里卖水果的小贩，价格公道从不缺斤短两，无论买多少水果都一样热心周到；怀念那里卖冒菜的四川老板，一个漏勺塞多少菜全由买主，热腾腾的汤锅里总炖着一只整鸡……这些做生意的人与农民工好像相辅相成，他们自己在经商谋生，却也懂得异乡人的艰辛，为农民工节省了一笔不小的日常开支。木塔寨就像一个小社会，容纳着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异乡人，无论卖家还是买主，谁也离不开谁。

曾经日日拥挤的主干道早已了无人烟，农民工不知何时搬离了木塔寨，那些商人们恐怕也都另谋出路了。不远的将来，这里会挤满高楼，以现代化的崭新姿态融入西安高新区的大背景中。另外一批同我类似的异乡人会工作生活在这里，为他们心中的梦想扎下根，与曾经住在这里的农民工一道，构成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的生命体。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也将成为实实在在的西安人。然而，那些牌楼，那些人都会同隋唐木塔一样化为历史。最后，“木塔寨”仅成为一个地名符号，以自己独特文化背景组成繁华高新区的一部分。





傅介子

汉代出使西域的著名使者

提起出使西域，谈及丝绸之路，一般人都会想到西汉的张骞和东汉的班超。其实，在出使西域的人群中，还有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就是西汉人傅介子。

傅介子(? 一公元前 65)，北地义渠(今甘肃庆阳)人。当时的西域，形势异常混乱。匈奴在重整旗鼓后，又卷土重来，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龟兹(qiū cí)、楼兰等西域小国，纷纷倒向匈奴一方，在古驿道上经常劫杀汉朝的使节和过往商人。特别是楼兰，由于地处咽喉之地，其劫掠行为的危害程度更为严重。公元前 92 年，楼兰王死，匈奴急忙送侍子(充当人质的王子)安归回楼兰继承王位。安归由于长期在匈奴生活，加之匈奴帮其继位，因而倾向匈奴，而与汉朝为敌。先后攻杀汉朝派往西域的多批使者，又杀害了大宛、安息等国派往汉朝的使者，使汉朝与西域的交往因此断绝。

这种情况使西汉朝廷很是苦恼，元凤三年(公元前 78)，傅介子上书朝

廷，自愿出使大宛。汉昭帝和霍光令他途中经过楼兰和龟兹时，责备两国国王背叛汉朝、杀害汉朝官员和使者的行径。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傅介子与部下到了楼兰。楼兰王明显表现出不亲和汉朝的态度，但是迫于汉朝的强大，倒也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面对这样的情况，傅介子决定采取迂回战略。于是，傅介子一行假装离去，但心里却在谋划对策。到了楼兰的西部边界，傅介子对送行的楼兰国翻译说：“我们汉朝的使者带着黄金、锦绣准备赐予各个国家，你们的国王既然不愿意接受，我们就去其他国了。”其随行人员心领神会地随即向楼兰国的翻译展示了准备好的大量金币。

楼兰国的翻译返回后将所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楼兰王，楼兰王贪念汉朝使者所带的财物，于是来见汉朝使者。傅介子与楼兰王对饮，又一次将金币等物展示给楼兰王。等到双方饮酒都有些醉意时，傅介子对楼兰王说：“我们的天子让我私下向大王报告一些重要情况。”楼兰王起身跟随傅介子一起进入帐中，傅介子装作对楼兰王耳语，这时安排好的两名壮士从背后刺死了楼兰王。看到这一情景，楼兰王的左右四下逃散。傅介子对他们说：“你们的国王有负汉朝，是戴罪之人，我们的天子派我们诛杀他，现在应当立汉朝的侍子、安归之弟尉屠耆为王。我们汉朝的大军马上就到了，你们谁也不许乱动，如果乱动，我们就灭亡你们的国

●历代名人与西安●

家！”楼兰上下被傅介子的威严所吓倒。于是傅介子立汉朝的侍子、安归之弟尉屠耆为王，安抚楼兰居民，并改楼兰国名为“鄯善”。

傅介子行刺楼兰王后，新的楼兰王尉屠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以前数代楼兰王都是因为身处汉、匈奴两强之间无法平衡，从而身遭横死的。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摆脱厄运的方法就是不能再左右摇摆，而是应该完全依附于强大的汉朝。于是他请求汉昭帝派兵到楼兰驻扎，汉昭帝应允，立即派司马 1 人，率吏士 40 名，前往伊循（今中国新疆若羌附近）屯田，并借此镇抚楼兰，后来汉朝又在此设置都尉。自此，伊循城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重要支撑点，同时也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其后，傅介子因功被朝廷封为义阳侯，赏赐食邑七百户。

傅介子的传奇经历为后人所赞赏，诗人李白在《塞下曲》中赞颂他：“愿作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著名作家高建群曾以傅介子为主人公写就中篇小说《刺客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之间，傅介子是另外一位著名的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者，是古丝绸之路的维护者和见证者。

今甘肃庆阳西塬石马坳有汉义阳侯傅介子墓。墓前原有石马、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并有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 年）游击将军张桓刻立的墓碑，碑文由吏部郎中姑苏都穆书写。石马坳因墓前有石马而得名。明代大文豪、邑人李梦阳在其《华池杂记》中也写道：“不亩陵，庆阳东山；傅介子墓，西山”。

·解字·

“半”



①



②



③

白居易的《卖炭翁》：“半匹红绡一丈绡，系向牛头充炭直！”这里面的“半”字也是个会意字。金文①的上部是个“八”字，是“分”的意思；下部是个“牛”字，把一条牛分成两部分就是“半”字的本义。小篆②的形体，也基本上同于金文。③是楷书的写法，变走样了，上部的“八”变成了两点，下部的“牛”变成了两横一竖。

“半”字的本义就是二分之一，如半尺布、半文钱、半壁江山等等。由“二分之一”又可以引申为“大块”的意思，如《汉书·李陵传》：“令军士人持二升糒（bei 备）、一半冰。”这句话的大意是：命令战士每人拿着二升干饭（“糒”）、一大块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半”字若读作 ban（办）那就不对了，应读作 pan（盼）。可见“半”字也是个多音多义词。

《清麓丛书》的编者和版本

◎ 王 翰

三原贺瑞林即贺复斋先生，是清季关中理学大家，著名学者牛兆濂（即俗所谓牛才子）的老师。因其生前曾于泾阳清凉山麓创办清麓学舍且自署清麓，牛等门生恒以“清麓先生”或“清麓先师”称之，民国所出《清麓丛书》，也是以其别号而命名的。

关于《清麓丛书》，新出《三原县志》人物传称：“贺瑞林主讲正谊学院 20 年，学体兼用，精研程朱之道，刊印经典汇集为《清麓丛书》……”，言下此书为先生在世时刊行；《咸阳市志》第五卷称：“贺瑞林主讲正谊学院 20 年……书院还办有印书局，刊印《清麓丛书》”，言下此书不仅为先生生前刊行，并且是书院自己刊行；《古籍信息网》信息展示，则书名写作“西京清麓丛书”，作者写作“(清)贺瑞麟辑”，出版社又称是“传经堂”所为。两志肯定有误，网传也多不明之处，有待揭发。

据可靠史料，《清麓丛书》所收各书，是先生生前校订或刊印过的，但其汇集刊行，则是先生逝后，蓝田牛兆濂筹款赎版、兴平张元勋（鸿山）长院主持的，其他众多门生亦多施以援手。淄川孙灵泉（迺昆）1935 年为牛兆濂《蓝川文钞续》所作序文说：“清麓先师在日，劝富室所刊诸经传，及宋五子书与夫近代纯儒文集，板皆藏于各家。蓝川知诸书皆道脉所关，薪传所系，因筹款二千金，将书板一概赎回，

故张鸿山主讲清麓时，得以刷印广布。去岁蓝川弟子杨仁天、刘允臣复筹巨款，拟刷印二百部流播各省，自此先师之学不难大放光明，而周程张朱之传、孔曾颜孟之统，值此晦盲时代，得以绝而复续，若非蓝川将板赎回，安得成此巨功？然则蓝川此举，不独为师门之功臣，真宋贤之功臣，亦前圣之功臣也，升中丞称蓝川为师门第一功臣，刘督军称蓝川为关中第一名儒，均非溢美矣。”固已言其大概，牛兆濂所撰《〈清麓丛书〉序》，更将此书汇辑印行之颠末，说得至为清楚和详细。序文如下：

载天地万物而终始之者，道也。顺之则治，逆之则乱，非圣人不能尽之，非几于圣者不足以知之。三代之上，有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删定六经以垂教万世，而尧舜以来相传之道明；三代之下，有朱子集群贤之大成，阐明经义俾孔子之道如日月中天，而百家纷纷之论熄。故言道而不衷孔子，乱道也，言孔子之道而求异于朱子，妄言也。学者欲求孔子之道，舍朱子之书何以哉？顾其书之得也不易，则其道也传之不广，此先师清麓先生所以有洛、闽学派各书之刻，而传经堂板（版）所由风行海内也（朱子外周、程、张子、许、薛、胡、陆各书略备，及门刘君东初任刻）。亡何而先师即世，板片之键闭于刘氏者，且廿有余年，道

●学术交流●

之不明也，异说蜂起，方且举纲常名教之大防决而去之，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今其敝已甚，则其说以穷，而纲常名教之在人心者，终不可得而泯也，有识之士，必将深求夫大中至正之归，此殆吾夫子之道与吾朱子之书否极而亨之机乎？而刘氏之藏以出，好义诸君复乐为资助以趣其印行（丙辰冬，刘氏介刘吉六同学以所刻各板捐存精舍，约以二千金为酬。濂难之，乃谋诸杨克斋先生，先称贷归之。时乃婿贺君景口，即认捐五百金，余所贷则刘乐山君实任之，事赖以济。嗣韩君翕堂亦捐如贺君之数，郭君希仁、刘生守中又赍来陈督捐款千金，偿所贷适足。三原李令翰亭为筹开印费七百五十金，张生雅健以舌耕所得捐十金，为助亦不容没其美，例得备书），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此外先师所订如柏经正、刘述荆等各刻，亦皆借取以来，汇为丛书而分布行之，可谓洋洋大观也。濂垂老无闻，慨大道之将废，自恨无一援手之力，斯役也幸得及身见之，惟有藉简册之流布，代笔舌之所传，用绍我先师之志，俾薄海内外人人得闻孔孟程朱之言，义理薰聒，久久成为风气，安在无聪明睿智者出乎其间，有以统一环球之学说，则世道人心所得赖以取正，而大道之行或庶几一遇之也，斯则所厚望于读此书者尔。

所以两志所载，似是未见原书，道听途说得出的结论，不足为凭。至于网传诸端，作者署为“（清）贺瑞麟辑”，最好理解，因为据史革新《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一文讲，从1854年起，先生讲学之余，就已着手编印各朝理学书籍，到1893年去世为止，已出版达百余种以上（见《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此书既是在先生原刊各书基础上汇辑而成，

仅仅加进其生前“订如柏经正、刘述荆等各刻”，则其门生将编者的荣誉推予乃师，所谓尊师重道，情理可原，自是一段佳话。而传经堂者，牛兆濂序中亦已提到，应该是当时三原或省垣某个有名的书坊，而且极有可能就是先生清麓、正谊讲学时，精舍和书院自办的书坊，以牛序的说法，此书之外，先生之前所刊各书，也都是经由此坊印行的。最费唇舌的唯有书名。诚如前引，牛兆濂序文标题已明确讲，此书的名称是《清麓丛书》，史革新《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也有先生“门生后人把这些出版物汇编成一套大型丛书，定名为《清麓丛书》”的说法，既有当时当事者之证言，又有后来研究者的考证，则其书名确为《清麓丛书》，应当不该再存什么疑问。网传所谓“《西京清麓丛书》”云云，惜乎无由得见原书，但是世间确有此书，窃意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其前面既然冠以“西京”二字，则极有可能是1932年之后的刻本，应该晚于《清麓丛书》，与《清麓丛书》不是同一时期的同一版本。因为省垣长安虽然历史上曾数称西京，然而晚清不曾这样称呼，民国如此称呼，也只能在1932年3月初旬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明确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之后。省垣出书冠此二字，自不必说，三原毗邻西安，素称京畿，再版冠此二字以吸引读者，也不是没有可能。其次，网上百度，所谓《西京清麓丛书》，似乎还有正编与续编之说，真确与否，不得而知，设若事情确是如此，则此网传此书，究竟是正编抑是续编，显然没有交代清楚，进一步的情况，仍然还是待解之谜。

西汉名臣张安世

◎ 宋亚颖

2008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勘探时在西安市南郊凤栖原发现了一处占地面积很大的家族墓地，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规模宏大，还在于大墓主人的显赫身世。有媒体在报道中对墓主的描述是“三朝重臣，九世封侯”，文物专家根据出土的“张”字铜印和“卫将长史”封泥，断定大墓主人就是西汉姓张的卫将军张安世。

张安世字子孺，京兆杜陵人（今西安市东南），是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张汤之子。汉朝允许高官保举子弟入仕，张汤历任廷尉、御史大夫，张安世得父亲庇荫，少年时代即在宫中做郎官。郎官的本职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为皇帝看门护驾，虽说荣耀，但毕竟类似于跟班的小厮。张安世就不同了，武帝派他以郎官的身份到尚书令手下做事。尚书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皇帝掌握天下事除了通过三公九卿，另外就依赖尚书了。再说三公九卿五日一朝，并不能天天见到皇帝，平日的很多奏章往往要汇集到尚书，然后呈皇帝御览。如此重任，若不是张安世大才堪用，武帝岂能让他去做？

汉武帝待下十分严苛，张安世不敢怠慢，就连放假也从未休息过。如此勤勉，再加上父亲位高权重，张安世的仕途前景本是不可限量的。不幸的是，元鼎二年（前115），他父亲出事了。当时朝中有几个大臣因嫉恨张汤，联合

丞相庄青翟，告发身为御史大夫的张汤，理由是朝廷议定一些经济措施后，张汤总是给大商人通风报信，作为回报，商人们肯定也给了张汤不少好处。汉武帝最痛恨手下背着自己搞小动作，不过，念张汤多年来劳苦功高，他原打算只给予警告。他问张汤：“我很奇怪啊！为何我想干什么，那些奸商都会提前知道呢？朕的好御史大夫，你说说。”张汤心存侥幸，以为武帝尚不了解内情，推说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汉武帝认为张汤死到临头不知悔改，竟然还敢欺骗自己，一怒之下将其处死。可追赃的时候，张汤的家产还不超过五百金，都是朝廷过去给他的赏赐所得，不存在违法暴富的问题。汉武帝意识到是有人刻意要陷张汤于死地，于是将包括丞相在内的告发之人全部诛杀。

父亲犯了死罪，通常来说，出于皇帝人身安全的考虑，张安世根本就沒资格继续呆在皇帝身边了。只因武帝觉得挺对不起张汤，非但没有赶张安世出官，还想找个合适机会提拔他。有一年，汉武帝出外巡察，丢失了三箱书，问遍群臣，无人知晓。张安世却能把内容一一誊写下来，供武帝阅览。武帝悬赏得到原书之后，拿来与张安世写的仔细对比，竟然没有丝毫差错。虽说汉代的三箱书写在笨重的竹简上，不比纸书，但三箱竹简所能书写的內容仍然是相当多的，张安世能默写下来，着实

令汉武帝惊叹不已,于是他被提拔为尚书令,后来又升任光禄大夫。

按这势头,到汉武帝去世时,张安世说不定也能成为钦定的辅政大臣,可他的运气实在糟糕,又一次受到亲人的牵连。征和二年(前 91),皇太子刘据因遭人诬陷,出于自保,与父亲汉武帝兵戎相见。事后,凡与刘据有瓜葛的,都被武帝处死。张安世的哥哥张贺是太子身边的红人,也被逮捕治罪。为救兄长,张安世冒着生命危险给武帝上书,请求网开一面。武帝可能还是放不下二十多年前冤杀张汤的事情,答应放张贺一马,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贺被处以宫刑。

四年后,汉武帝去世。算起来张安世已经在武帝身边呆了三十多年,资历可谓深矣。但父亲做了刀下冤魂,哥哥受下奇耻大辱,谁也不能保证张安世的心中没有因杀父辱兄而燃起的复仇火焰。再说巫蛊之祸是表明大臣立场的关键时刻,在这个事情上,张安世营救兄长,尤其让汉武帝感觉到他还是有私心的。如果让张安世辅政,难保他对自己的内心积怨不会发泄在即位的小皇帝身上,因此武帝并未将他列入托孤大臣的名单。

汉武帝死后,年仅 8 岁的幼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辅政的大将军霍光认为张安世忠诚谨慎,有意重用他。但霍光虽是武帝钦点的首席辅政,却并非唯一的托孤大臣,除了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碑、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金日碑死得早,上官氏、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元凤元年(前 80),他们联合昭帝的姐姐鄂邑长公主、哥哥燕王刘旦,企图杀掉霍光,废黜昭帝。霍光得知后,抢先下手,将参与谋反的人一网打尽,随后任命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右将军名号代表他已进入辅

政大臣的行列,而光禄勋职在统领守卫宫廷禁地的众多郎官,张安世四十年左右的仕途终于迈上了一级大台阶。

辅佐昭帝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古代有“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统观念,昭帝在汉武帝的子嗣中既非嫡也非长,他的帝位除了面临两个兄长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很大挑战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一直困扰着昭帝和辅政大臣。昭帝的大哥刘据虽然死于巫蛊之祸,但这位故去的太子却留下了唯一的孙子刘病已。因为刘据是冤死的,宫廷内、社会上弥漫着对故太子的同情之心,刘病已也得到很多人明里暗里的护佑,张安世的哥哥张贺作为刘据的故旧,就是其中的一位。

汉武帝末年,刘病已因受祖父一案的牵连,原本生活在牢狱中。武帝后来知道刘据是被冤枉的,但他实在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错了,再加上他有意立幼子为太子,也不能端端地下诏恢复刘据之孙刘病已的皇族身份,因为他知道,这么做将会给幼子刘弗陵带来麻烦。汉武帝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临终前他颁布一道大赦令,刘病已夹杂在大批罪人中被释放了。由于不是针对一人的特赦,出狱时年仅五岁的刘病已成了烫手的山芋,掌狱的丙吉将他送到京兆尹府,京兆尹对这个敏感人物不敢接纳。丙吉与刘病已祖母史良娣的娘家联系,这才给刘病已找到了归宿。

不久,刘病已又被送入掖庭抚养。接纳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安世的哥哥张贺。原来,张贺遭遇宫刑之后,到后宫中担任掖庭令,负责为妃嫔们提供后勤保障。念及刘据的往日情谊,张贺待年幼的刘病已如同己出,不但拿出自己的俸禄伺候衣食,还供他读书。刘病已

渐渐长大,他身体里流淌着皇家的血液,似乎深得上天眷恋,一些离奇的现象往往发生在他身上,比如他脚底板长毛,睡觉的地方常常有神光闪耀,只要他去哪家买饼,哪家就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民间甚至传言,上林苑中有树叶被虫咬过之后,竟然咬出了“公孙病已立”的字样。张贺觉得刘病已前途不可限量,欣喜之余又对张安世言及这类事情,张安世严肃告诫兄长,“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刘病已是武帝曾孙)

后来,刘病已到了娶妻的年纪,张贺想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他,去征求弟弟的意见。张安世怒气冲冲地说:“刘病已是故太子刘据的后代,作为罪人的孙子,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在掖庭供养长大已经是他人人生最大的福分了,你竟然还打算把闺女送给他,我坚决不同意,你再别说这事!”张贺畏惧贵盛的弟弟,打消原先的念头,转而与手下负责布匹织染的暴室啬夫许广汉商量说:“刘病已虽说现在地位不高,但毕竟与当今圣上有亲,假以时日,最起码能得一个关内侯的封爵。你的女儿嫁给他,也会跟着享福的。”许广汉也是受过宫刑的人,心想自己耻辱一生也就罢了,女儿若能找个好人家嫁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他满口应允了张贺,将女儿许平君许配给刘病已。

其实张安世也是为哥哥着想,但兄长也不知怎么想的,竟然把他说的话都告诉了刘病已,导致他在后来的汉宣帝时期备受煎熬。不过此是后话,在昭帝时期,由于他竭力维护昭帝的正统地位,深得昭帝与霍光的赏识。元凤六年(前75),昭帝下诏封张安世为富平侯。

张安世封侯次年,二十一岁的汉昭帝暴病身亡。在这非常时期,为加强宫廷防卫,霍光请求太后任命张安世为车骑将军,并与张

安世商定拥立昌邑王刘贺。但刘贺不遵法度,重用从昌邑国带来的一群人,将昭帝旧臣弃置一边。霍光很不满,又联合张安世将其废掉,改立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新皇帝虽然年仅十八岁,但城府极深。尽管他在民间时就“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尽管他很讨厌张安世,也不得不压抑自己掌权的渴望,对拥立他的功臣们毕恭毕敬,一上台就大加封赏。张安世的功劳仅次于霍光,增封了一万零六百户的租税,宣帝又拔擢张安世的三个儿子千秋、延寿、彭祖到自己身边任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消除权臣的疑心,使宣帝的位子更稳固。

但好景不长,大将军霍光于地节二年(前68)去世。御史大夫魏相认为车骑将军张安世是当之无愧的大将军人选。宣帝也正有此意,表示接纳魏相的建议。张安世心知道自己得罪过宣帝,哪里敢担此重任!他跪着向宣帝哀求:“老臣风闻传言,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陛下说吧,拜官的诏书还没有下发,好像臣自作多情一样。不说吧,陛下又未必知道老臣的心思。今日斗胆面见陛下,就是想说明臣能力实在有限,怎能挑得起大将军留下的这副重担啊!恳请陛下慈悲为怀,可怜可怜臣这一把老骨头,使臣得以天年而终。”他说得如此严重,宣帝不禁笑了:“君言泰(太)谦。君而不可,尚谁可者!”几天后,张安世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不久又改任大司马卫将军。将军官前缀以“大司马”名号意义重大,想当年,只有霍光一人官号前缀以“大司马”,合称“大司马大将军”。张安世加“大司马”衔,实际上就是获得了首辅的地位。

霍光死后,宣帝开始压抑霍氏的权力,招致霍家萌生反意,正在此紧张时刻,霍光夫人

毒杀宣帝原配许平君的罪行暴露。宣帝与许平君是贫贱夫妻，非常恩爱，霍家认为宣帝必然不会放过他们，于地节四年（前66）谋反，被宣帝镇压下去。霍氏之乱令张安世方寸大乱，因为他与霍家瓜葛不浅。他本人是霍光提拔的，更要紧的是，张安世有个孙女叫张敬，嫁入霍家，霍家一谋反，孙女要连坐。为这个事情，张安世多次想向宣帝求情，可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他自己尚且危如累卵，弄不好，非但救不了孙女，连自己也得脑袋搬家。细心的宣帝观察到张安世最近越来越瘦，无精打采的，觉得蹊跷，问身边人，方才知晓车骑将军的心病，很快赦免了张敬。如此厚恩让张安世觉得无以为报，好像欠了宣帝一笔账似的，如果自己做得不好，皇帝可能随时会来讨债，并且是新老账一起算。为避免这样的结局，他开始以自己特殊的处事方式隐于朝廷。

一是力避给宣帝留下结党营私的印象。西汉的大政方针是皇帝与身边的大臣讨论确定的，这些人包括辅政的将军。商定后还是由皇帝身边人写成诏书，然后发到丞相、御史大夫府中安排执行。张安世每次参与商讨之后都向皇帝请病假，要求回家休息。如果此后不久有人告诉他朝廷又发布了新诏令，他都做出很吃惊的样子，假装自己压根不知道这回事，还派人至丞相府询问详情。张安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朝臣都以为他已经没有实权，不用白费力气地来巴结他，因此也就不会受到结党营私的指责，可以有效避免自己的光芒遮蔽皇帝。张安世曾经举荐一人，为表示感谢，那个人登门道谢。张安世觉得为荐举贤良，本是国家赋予的分内之事，他来谢我，那就是国家的恩典当作了我个人施予的恩惠，太不合适了。万一被皇帝知道，可如何

得了！他交代下人以后再也不允许此人踏进张家半步。

二是突出宣帝的圣天子地位。有一位郎官仕途不顺，对张安世发牢骚。张安世批评道：“你劳苦功高，圣上自然一清二楚，升迁与否，由圣上做主。作为人臣，你怎么好意思自卖自夸？”表面上看，张安世拒绝为郎官说话，可通过私下运作，他却成功地给郎官升了职。他之所以明里拒绝郎官，就是不想让人抓住接受请托的把柄，从而损害自己秉持一片公心的正直形象。他手下的卫将军长史曾对他说：“将军辅佐明主，却不大引荐士人，朝中对此颇有非议。”张安世回答：“明主在上，群臣贤能与否自然是黑白分明。臣下做好自己就行啦，没必要也没资格向朝廷荐士。”可以说，隐藏自己的锋芒，而把汉宣帝置于绝对第一的位置，这是张安世求得安全的关键一招。

三是宽厚待下。当年父亲张汤之所以被告发，就是因为他后来者居上，利用自己执法大臣的身份处理了很多人，同时也得罪了很多人。张安世鉴于父亲的教训，对待下属十分宽容。有一回，一个郎官酒后在宫殿内随地小便，主事禀报张安世，要求治罪。张安世回护道：“说不定是汤水洒在那里了，如此小过错哪里够得上入罪呢？”有的时候，他为了不得罪属下，竟然略显蛮横。有个郎官玷污了官府的女婢，女婢的哥哥控告郎官，张安世说：“郎官是衣冠子弟，怎么会做这种事？女婢必定是与郎官有矛盾，出于愤怒，故意诬陷郎官的。”女婢非但没有告倒郎官，反而在张安世的安排下，遭到自己的主管部门严惩。这虽然有失公平，但笼络住手下官僚，他就可以在朝中少一些敌人，当然于己有利。

张安世在宣帝时期想尽各种办法隐藏自己的锋芒，这当然与他自己小心谨慎的性格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宣帝迫使他不得不如此。宣帝虽是西汉一朝的中兴名君，但这个人也有许多毛病，最受诟病的就是心胸不够开阔，对他本人当皇帝之前的坎坷经历耿耿于怀。即位后，他是有恩必报，但同时也对那些曾经压抑过他的人怀恨在心。他刚做皇帝那几年，由于霍光在世，宣帝还不敢怪朝臣们不提携他，因为即便是首辅霍光也没有早早地立他为帝，在他正遭遇不幸时，霍光的眼里只有汉昭帝。但霍光一死，宣帝腰杆立马挺直了。张安世谨小慎微，远不像霍光那样威严可怖，资历也不如霍光。宣帝终于敢发泄自己的怨气了。

宣帝曾对张安世说：“我没有当皇帝的时候，你的哥哥张贺常常对你谈到朕，你却不让他说。做得太对了！”这听起来绝非表扬的话，而是充满了报复、得意洋洋、讽刺挖苦、无奈等种种复杂情绪。口头讥讽还不算，据《汉书》记载，宣帝因为张安世在昭帝时期压抑他的声名，曾对手下爱将赵充国流露过想要杀掉张安世的意思。赵充国认为张安世是三朝老臣，为人也不张扬，朝廷内外对他的评价比较好，如果皇帝因为个人积怨就将他处死，不仅难以服众，也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形象，宣帝这才打消了念头。

元康二年（前64），已亲政四年、大权在握的宣帝打算回报过去的恩人。但掖庭令张贺已死，宣帝只好把褒奖的对象转为张贺之子张彭祖。彭祖并非张贺的亲生儿子，实际上他是张安世的小儿子，只因张贺的独子死得早，这才把张彭祖过继给张贺。再加上张彭祖小时候曾经和年幼的宣帝一起读书，宣帝当然

要大加封赏了。这时候，张安世又坐不住了，彭祖虽已过继给兄长，但真实的血缘关系根本撇不清。他本人已受封富平侯，如果再封彭祖，他们张家就是一门两侯。常言道，月盈则亏，极盛而衰，张安世深谙此道，为家族长远计，他请求不要封张彭祖。宣帝不耐烦地说：“我是为掖庭令才这么做的，并不是因为你。”言下之意就是你张安世少管闲事，当初不帮我也就罢了，如今我报答曾经帮助我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张安世就此闭嘴，再也不敢说及张彭祖的事情，宣帝遂封张彭祖为阳都侯。张安世因为父子俱为列侯，家族势力太盛，上书自减俸禄。宣帝下诏将张安世辞掉的俸禄另行贮存，两三年间即积累了数百万钱。

元康四年（前62）春，张安世身体欠佳，请求退休。宣帝说：“将军老成持重，又是三朝旧臣，朕甚为依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产生了退休的念头呢？朕若准了，让天下人都讥讽朕遗弃老臣，朕情何以堪？希望将军注意饮食，及时用药，存养精神，以辅天年。”这一次，张安世似乎误会宣帝了，宣帝并非怀疑他装病，而是让他赶紧养病，养好了继续出来做事。但君臣间的关系过于紧张，张安世不免多想，他认为宣帝是责怪他故意偷懒，也不敢休养了，强撑病体处理政务，一直坚持到秋天病逝。

据史书记载，张安世是西汉宣帝时期重臣。张安世的封国虽在山东，但是汉帝却将位于凤栖原的这块风水宝地赐予他做家族墓园。张安世辅佐三朝皇帝，本人聪明且低调，所以可以长立朝廷而不倒，其家族中八代封侯，整个家族兴盛了近200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日本修改宪法第 9 条意欲何为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自民党将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第 96 条。日媒分析说,安倍此举实际上是欲先修改宪法第 96 条,以放宽修宪提案条件,进而修改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的宪法第 9 条。何谓宪法第 9 条?日本政府为什么又急欲修改宪法第 9 条呢?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和平宪法”未受到过实质性的挑战

战后初期,美军对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制定新宪法《日本国宪法》,以最高法规形式确保改革成果。《日本国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宪法”,源于宪法第 9 条。宪法第 9 条分为二款,如下: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第 9 条和平主义理念指引下,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也保持了大体的和平稳定。

尽管“和平宪法”带来了诸多正面因素,但实际上日本国内谋求修改“和平宪法”的活动从未停止。修宪运动从 20 世纪 50 年代鸠山内阁时期发端,自 1954 年自由党、民主党等组成宪法调查会,主张应对“天皇”、“放弃战争”等方面进行修改。而修宪的思想在鸠山

内阁时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1955 年 3 月,首相鸠山在众议院回答质询时表示:宪法要修改,重点是第 9 条,前言也要修改。“为了自卫可以保持军队”,甚至“可以保持现代化的军队”。由于社会党、共产党等反对修宪的政党在国会中所占的议席超过了 1/3,鸠山修宪的意图无法实现。但是,正是在鸠山任内修宪与护宪之争从民间上升到政党之间、内阁与国会之间的高度,而自卫队的合宪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的解决,成为战后日本修宪的一个争论焦点。

修宪运动在岸内阁时期,进入第一个高潮。在岸信介时期,修宪论者认为“宪法是美国强加的”,即认为一国的宪法的制定应由本国人民自由意志决定,在美军授意下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是“强加宪法”,因此应重新制定一部自主宪法。但在以宫泽俊义为首的学者进行的理论上的驳斥下,宪法强加论基本上得到澄清。进入七八十年代后,日本修宪运动相对平稳,“和平宪法”基本上未受到实质性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开始希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政府推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成为经济大国,国民个人平均所得超过美国。因此,原本日本赶超型政治体制发生了危机,日本从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

背景下,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日本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了“国际国家论”。而与中曾根的“国际国家论”相似的则是日本政要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

“正常国家论”是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来的。小泽在书中提出,在冷战结束后,日本只有“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才有出路”,真正的国际国家就是成为“正常国家”。而成为“正常国家”有两个条件,一是,“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实行”,为此要“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作出国际贡献”,“日本与欧洲、美国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日本的一举一动已影响到世界各处。”“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责任。”二是“对努力创造丰富稳定生活的国家以及地球环境等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做出最大的合作。”

修宪派认为:若不依靠国际协调,就无法保证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应修改宪法第9条

小泽的观点在当时相当有影响力,《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认为“和平宪法”阻碍了日本“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观点有相当代表性。小泽一郎在其《日本改造计划》中认为:“目前国际社会要求日本以联合国为中心做出贡献,必须把宪法同联合国宪章统一起来。社会的进步是如此之快,因此,在50年当中必须对宪法进行一次修改”。小泽的设想就是通过联合国,使日本成为可以如英、美、法那样向海外派遣军队,参与国际冲突的“正常国家”。小泽认为,日本把军队“完全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就不存在什

么“国家使用武力”,而且,日本军队可以“采取行动,甚至参加作战”而不违反日本宪法。

1999年,小泽一郎又发表“日本国宪法修改试案”一文,在文章中小泽提出,在当今世界,日本不依靠国际协调就没有生路。日本应积极呼吁建立联合国军队,并且率先实行。日本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利用包括提供兵力在内的各种手段为世界的永久和平做贡献,以往只出钱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做的结果,也是保卫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此后,日本各界都有提出宪法修正方案,尽管其修宪的方案各异,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就是:针对国际现实而论,因为日本若不依靠国际协调、国际合作、即无法充分保证自身的安全,因此主张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参与联合国军队,于是才籍宪法第9条的修正,使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

日本寻求“正常国家化”的实质,是希望取得“对何种问题说是,对何种问题说不”的权力

当然,无论为国际安全还是为国际经济做贡献,都不是日本推行“正常国家化”战略的真实的战略目标。从更深层次的意义讲,成为自主性的大国才是日本“正常国家化”战略的实质,其战略目标和核心就在于自主性,自主性构成了“正常国家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冷战期间,日本依托美国,主要实行“被动外交”,但今天的“日美基轴”体制已不同往日,日本一直在寻找。日本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扫除国家战略转向(转向“正常国家”)的障碍,特别是中、朝、韩等国对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外部压力。正如日本外务省审议官

●史料钩沉●

加藤良三说，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值得信赖、最好说话的伙伴和盟国而采取行动，不是追随美国，同盟不是“命运共同体”，而基本上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表明强化日美同盟与其说是日本的长期战略，不如说是一种策略选择更为合适，其终极目的依然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因此，那种认为只要日美同盟存在，日本就不会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试图利用日美同盟来制约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做法，没有真正看到日本这种政策选择的真实目的。

而实际上随着“正常国家化”战略的推进，日本已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自己整个外交战略的最核心目标。而日本对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就是为了达到成为“正常国家”的目的。对此，1994年5月26日的《日本经济新闻》直言不讳道：“对日本来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目的，只不过是手段。重要的是成为常任理事国后，对何种问题说‘是’，对何种问题说‘不’。”

通过修宪成为“正常国家”已是日本国民共识，但具体到修改第9条，民间反对意见仍占上风

通过冷战后二十余年的努力，“正常国家化”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整体价值取向，可以说，“正常国家化”并不是日本少数右翼政治家的主张，而是日本人民的真实意愿。日本社会意识已经有着明显的保守化倾向，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复苏乏力，政局动荡，国民普遍对现实不满，求变心切，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主张对外强硬的“鹰”派政治家人气急剧上升。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好转，并且日本政府

防卫政策调整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小泉在日本民众中获得大量的支持。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小泉是目前最能把“正常国家化”战略贯彻下去的人选，为此他们才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保守主义文化底蕴激发出来。

日本国民对于修宪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一代，没有战争体验，护宪的口号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极大的魅力，民意开始向修宪倾斜，可以说修宪已经成为日本上下的共识。官方电视台NHK于今年4月19日起做了三天调查，得到全国约1600人回答结果是，赞成的民意为42%，反对的只有16%，说明赞成的比2007年调查时的41%略增、反对的则减少8%、犹豫的人增加了9个百分点为39%；《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民调结果是，认为应修宪的民意有56%、反对的为28%。当然修宪的内容涉及甚广，而在涉及核心的宪法第9条以及第96条上，民间反对声音仍然比较强，《朝日新闻》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自民党“修改宪法第九十六条”的主张，“反对”意见达54%。而关于宪法第九条，有52%的受访者认为“不应改变”。他们将成为日本修宪派的最大障碍。

但日本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绕过宪法重整军备并向海外派遣武装，“和平宪法”已名存实亡

实际上，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民众占多数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由于《日本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需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同意，而且还要经国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同意，修宪派要改动宪法第九条根本达不到法定的人数。于是，日本政府便改变策略，

转换手法,将试图明文修宪改为解释修宪。

1972年,田中内阁发表政府“统一见解”,称“战争力量”就是“为了自卫的必要的”限度的力量。只有超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力量”的范围,才是违反了第9条的规定。而“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力量”的具体界限,要根据国际形势和军事技术的进步状况来确定。自卫队根据自卫队法设置,没有超出防卫力量的界限,因此不违反宪法。“统一见解”不仅使自卫队的存在合法化,而且模糊了防卫的具体界限,从本质上篡改了宪法第9条的基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内阁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1986年12月1%的限制被突破(根据相关规定日本军费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后日本军费开支增长很快,年增长率达6%,不久便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1992年6月,日本政府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随后,日本政府迅速制定了实施计划,并发布有关政令。PKO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自卫队可以随时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下开往国外。

特别是在911事件后,日本先后通过“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案”、“海上保安厅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以及“有事三法案”等

法案,建构日本不受第9条的约束的紧急事件因应机制以及自卫队能够派兵赴海外行动的法律依据。由此,日本宪法的和平精神已经逐渐消失,和平宪法基本上名存实亡了。而此次安倍要修改宪法第9条,主要是对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的追认。

修改“和平宪法”就是意味复辟军国主义吗? 答案其实也很复杂

有了和平宪法真的能够维持和平吗? 答案是未必。毕竟和平与非武装二者之间存在不必然的依存关系,和平可能需要非武装,但是非武装的实施,却也不见得可以达到和平。宪法第九条制定后,环顾世界,不但核武器迅速扩散并强化,并不断爆发军备竞赛,加上911攻击事件以及恐怖主义的盛行,凡此种种都显现出和平的维持,看不出这种规范有助于和平的达成,然而这并不是就表示,此条文放弃战争、废除军备竞赛根本于事无补,而是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对立冲突的根源,并强化适合与核武时代的和平维持机制。

鉴于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态度,我们应对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保持警惕,但修宪在日本已成潮流,在此前提下如何保证和平,才是问题的关键。

(上接第27页)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党史上的三次危机与转机

2011年7月27日,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广州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4期读书讲坛上,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用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所经历的三次重大危机——长征前后(1934年—1936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和毛泽东逝世(1976年)产生的危机以及转机,并总结出六条成功经验。

三次危机——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危机。

六条成功经验——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灵活决策、趋利避害、协作配合、顺应民意。

军事危机:长征前后(1934—193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这意味着中共和武装力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只有8000人,减员非常严重。除了兵源损耗,粮草、被服、武器弹药也严重缺乏,陕北人少物稀,难以满足红军需求。更严峻的是,敌我力量悬殊,敌我比接近10:1。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和红军如何突出重围?通过李克农频繁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促成双方会谈,在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停止对抗、一致抗日的协议。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红三十一军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黄河以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就在这时,转机出现: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到了西安,发现事情并非如原先预料,国际舆论对张、杨的行为颇多非议,南京方面也准备出兵西安……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及时作出调整,决定不再提出审蒋、处蒋,而是逼蒋承认中央红军,一致抗日。通过一系列工作,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不剿红军。

西安事变,成为中央红军和我们党的重要转机。

粮食危机:大饥荒(1959—1961)

经历过3年大饥荒的人都知道,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不管人数多少,铁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

吹牛并非不上税，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总理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结果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

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高层权力危机：毛泽东逝世(1976年)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总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此时的高层政治格局出现多派并存。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下转第25页）



3月30日,朝鲜宣布朝韩关系进入战时状态。图为3月29日人们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参加集会。

朝韩八条热线如何“全军覆没”

朝鲜半岛的局势继续向战争的方向滑去,似乎没有任何回头的征兆。

4月2日,朝鲜宣布重启宁边核反应堆;3月30日,朝鲜宣布朝韩关系进入战时状态。之前的3月27日,朝鲜宣布切断朝韩之间的所有军事热线,“只能用枪杆子说话”。

韩联社称,这意味着朝美和朝韩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对话渠道和通信手段。在如此紧张的态势下,如果双方不能得到及时沟通,背后隐藏的风险是巨大的。也许,前线士兵因为紧张而扣动扳机,就会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定为一场战争的开始。

3月27日凌晨,朝韩之间的最后一条军事热线哑了。

自1974年设立之初,到今年3月底全部中断,这些连接半岛双方的军事热线命运几度沉浮,从一个侧面向世界传递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温度”。

朝韩军事热线最多时达八条

早在1974年7月4日,朝韩双方发表联

合公报后就开设了军事热线。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朝韩将开通三条军事热线,其中两条热线是电话,一条热线是传真。但是,由于1976年8月发生了两名美军在非军事区内被人用斧子杀害的事件,朝韩军事热线实际上便中断。随后,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的缓和,重建军事热线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2年9月15日,朝韩双方的军事代表在板门店朝鲜一侧交换了签有双方国防部长签字的协议文本,就军事热线开通问题达成最后协议。2003年,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朝韩军事热线再次建立起来,用以防止双方可能发生意外冲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起初,连接韩朝管理区域的军事热线共有6条,包括西海地区的3条和东海地区的3条。韩朝军事通讯线路为连接双方驻东海和西海军部控制室的通讯网,各连接东海地区12公里和西海地区6公里区域。

另外,韩朝为了防止在西海出现偶发冲

突,于2006年又开设了2条热线,但2008年5月朝鲜切断了这两条热线,直到现在也没恢复。若加上这两条热线,韩朝之间的军事热线最多时达8条。每条军事热线包括1条电话线路、1条传真线路和1条备用线路。

除军事热线外,韩朝之间还设有5条板门店热线,1条与联合国司令部的热线。

历史上曾多次切断后又恢复

朝鲜上一次切断军事热线是在四年前。2009年3月9日,一年一度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关键决心”开始,演习开始当天,朝鲜随即切断了与韩国的唯一一条军事热线,封锁了朝鲜金刚山旅游区和开城工业园区通往韩国的边境公路,动员所有军人做好战斗准备。

不过,当年“关键决心”联合军演结束后,韩恢复了中断的韩朝军事通信线路。几百名韩国工人和卡车当天通过陆路边界重新进入开城工业园区。之后韩国向朝鲜运送价值约合71.2万美元光缆及其他通信设备,以帮助朝鲜实现与韩国的军事热线现代化。

此后几个月,韩国与朝鲜关系出现缓和迹象。韩国向朝方提供的光缆等通信器材运送完毕,双方开始进行军事热线的更新工程。当年12月30日,更新后的连接韩国和朝鲜东西海管理区的军事通信线路正式开通运行。韩国统一部官员当天表示,在过去的几天里,韩朝双方对更新后的军事热线进行了试运行,在一切正常后于30日正式开通运行。该官员表示,今后韩朝双方能通过该军事热线更迅速、更稳定地交换有关出入境人员的信息。

作为朝韩之间重要的联络方式之一,多

军事热线在双方沟通及避免意外事件发生方面,发挥过关键作用。

2004年10月14日下午,韩方在东西部海上各救助了一艘因机械故障漂流到韩方一侧的朝鲜小型民间船只。随后,韩朝双方通过军事热线电话取得联系,就两艘朝鲜船只漂流到韩方一事进行沟通,韩方将对船只进行修理后连船带人一并于当年10月15日送回朝鲜。

朝美沟通渠道仍然存在

今年以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导致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3月5日,朝鲜切断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与朝鲜军方的热线。3月11日,由于对韩美联合军演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新决议感到愤怒,朝鲜突然宣布不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并切断了板门店的5条热线。朝鲜切断朝韩军方通信线路,意味着朝韩所有政府和军事联系都已中断,两国之间仅剩三条用作交换空中交通信息的电话线路。

3月27日,朝韩将军级会谈朝方团长在通知中表示,特此通知韩方,朝鲜从即刻起切断韩朝军事热线,此外位于西海地区韩朝管理区域的军事通信联络所的朝方人员将中断一切活动。朝鲜的通知还说,“朝美、韩朝之间没有任何对话渠道和通信手段”。

此次切断的西海地区的朝韩军事通信线路,主要用于入驻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企业的相关人士在开城工业园区的通行。4月3日,朝鲜禁止韩方人员进入开城工业园区。

至此,这些朝韩双方经营多年的热线可谓“全军覆没”。不过,这也并非表示朝鲜关闭了一切沟通渠道。

乾隆初年英国商人 如何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

“鸦片”是英语 opium 一词的音译。若追根寻源,此词则是由拉丁语“汁液”一词演变而来。而鸦片的另一个中文名称“阿芙蓉”,则源于阿拉伯语“afyun”。正像两个词所表明的那样,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和欧洲。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修纪》里,鸦片就已经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事实上,早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取回了真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到了宋代,用鸦片煎茶已经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故苏轼诗中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之句。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儿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雍正年间,鸦片成瘾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间,鸦片烟馆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雍正皇帝在 1729 年颁布圣旨,禁止这种毒品:“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

候。”(李圭《鸦片事略》)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极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 300 箱,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从 18 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 90%。因此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顺差是惊人的。1765-176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 302%。在 1775-1776 年间,这一比值是 256%。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 1700-1840 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 17000 万两。(《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

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 250 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 1600 印币,一翻就是 6 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 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 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 1/8,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 1/2 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

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做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 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 1814 箱。而 1798-1799 年,平均每年增至 4113 箱,到 1800 年,则达到 4570 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在几十年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 1807 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屿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 243 万余两。

1821 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 1000 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 1/4。鸦片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三)——兴安门

(隋唐长安城北郭门之一,实为人苑之门,在大明宫西侧。遗址约在今西安北门外建强路中段)

1.兴安门献俘

唐代时期,皇帝多在兴安门举行献俘活动。如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十月,平西蜀献俘刘辟;二年(807年)十月,平浙西献俘刘锜;十二年(817年)十一月,平淮西献俘吴元济;十四年(819年)二月,田弘正献李师道首,及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五月,斩李同捷与受俘;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八月十八日,平泽潞受献刘稹之首,皇帝都是登临兴安门受俘。时大陈甲士旌旗,文武百官序立门外左右,群臣、宗亲、蕃使等在楼前皆立班称贺,仪式极为隆重。

2.日兴安门外燎炬枯槐

开耀元年(681年),高宗与武后宠女太平公主出嫁光禄卿薛曜之子薛绍,薛宅在平康坊,并就近借皇城南宣阳坊东南隅万年县廨设婚席。成亲之日,送亲与迎亲队伍,浩浩荡

荡,从大明宫西出兴安门,经兴安门启夏门大街北段,南至宣阳坊。仪仗极为壮观,燎炬相属,以至将沿路两旁夹道槐树因火炬燎烤而多半枯死。

3.兴安门西宜春北苑

兴安门南的西侧,隔宫城东墙紧邻东宫东北隅的宜春北苑,此处为唐玄宗教习宫女乐舞技艺称为“梨园弟子”的又一处。

“皇帝梨园弟子”本指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禁苑梨园中置院,亲为教习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专习法曲及各种乐舞技艺之人。天宝(742-756)年间,玄宗又选宫女数百人,居于东宫东北隅宜春北苑,教习其乐舞技艺。此等习乐舞之宫女,虽在东宫宜春北苑而不在禁苑中梨园,但亦称为皇帝的“梨园弟子。”

西安曲江新区

曲江新区位于西安城区东南部，是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核心区域面积 40.97 平方公里，同时辐射带动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区域，发展区域总面积近 150 平方公里。

曲江新区践行陕西“文化强区”战略和“文化立区、旅游兴区”理念，充分依托陕西、西安大文化、大旅游、大文物的优势，以城市运营收益大力投资文化产业和公共设施，以大项目为带动，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事业和城市新区建设呈现出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迅速成为西安乃至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2002 年以来，曲江新区先后建成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国际会展中心、曲江池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等一批重大文化项目，组建了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曲江影视集团、曲江会展集团、曲江演出集团、曲江文化旅游集团、大明宫投资集团等六大产业集团，形成了以文化旅游、会展创意、影视演艺、出版传媒等产业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体系，跃升为西部最重要的文化、旅游集散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区域。

区内拥有 4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雁塔、青龙寺、汉宣帝陵、唐长安城遗址），3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秦上林苑宜春宫遗址、曲江池遗址、唐城墙遗址），4 个国家 4A 级景区（大慈恩寺、大雁塔景区、大唐芙蓉园、曲江海

洋世界）。公共园林面积总计 3300 多亩，基本上为免费开放的文化景区；六大文化场馆包括电影城、美术馆、音乐厅、大剧院、陕西文学馆和民间艺术馆，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系列文化广场包括大雁塔北广场、贞观文化广场、玄奘文化广场、和谐广场、中和广场等文化休闲广场。初步形成了区域公共文化设施的规模化、集聚化，成为西安城市公共文化休闲、消费的最重要场所。

2007 年成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2008 年荣获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奖；2009 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0 年荣膺国家生态区；2011 年荣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12 年荣膺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按照《西安曲江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2009—2020）》，曲江新区定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西部文化资源整合中心、西安旅游生态度假区和绿色文化新城。曲江新区将以二期扩区为契机，规划建设出版传媒产业园区、会展产业园区、国际文化创意园区、动漫游戏产业园区、文化娱乐产业园区、国际文化体育休闲区。影视娱乐产业园区、艺术家村落等九大文化产业园区，着手打造文化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效能最优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到 2015 年，曲江新区及其辐射区入区文化企业争取达到 2000 家，从业人数达到 10 万人，文化产业年产值达到 300 亿元，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第一级。



渭旗锣鼓

富小云 整理

周至县二曲镇渭旗村的渭旗锣鼓，俗称“威风锣鼓”，古称“击鼓刺秦”，至今已有 300 年历史。渭旗锣鼓基本表演人员 150 人，另有 50 人为更换替补人员。表演形式在传统的鼓、钹、锣基础上，又增添了夹板舞、伞、扇舞、绸舞、长号等内容。表演一般分三个章节，第一节为开场锣鼓，又为战前锣鼓。鼓点似顷刻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犹如万珠散落玉盘紧促而激越，是为鼓士气、壮士胆之鼓；第二节为对弈锣鼓。鼓点稍缓，但更为强劲，大、中、小鼓以及手鼓齐敲，大钹、小钹同响，大锣、小锣共鸣，战旗在队中穿梭，凛冽飘舞，夹板、花伞穿行其间，让人眼花缭乱，同时感受到了两军对垒时兵将拼力厮杀，气壮山河的气势；第三节为喜庆锣鼓，又为凯旋锣鼓。鼓声欢快明朗，喜庆热烈，为兵将战捷庆贺之鼓。

渭旗锣鼓的基本特征：1、具有综合艺术特性。渭旗锣鼓集民间鼓乐、舞蹈、武术表演

为一体，鼓、锣、钹配以夹板、伞扇舞、翻跟头，而且击鼓、敲钹、打锣演员随着鼓点的变换，形神随之变幻，时起时伏，时庄严肃穆，时喜悦高亢，从而使锣鼓更加鲜活，更加精彩。2、阵容强大，气势恢弘。渭旗锣鼓目前参与表演人数超过 200 人，锣鼓队包括指挥、表演、仪仗、后勤人员近 300 人。强大的阵容、威风的气势、精湛的表演技术使渭旗锣鼓远近闻名。3、主题鲜明，鼓谱独特。渭旗锣鼓的主题为激发斗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夺取胜利。鼓谱划分为三部分，即战前开场、对弈拼搏、凯旋庆贺均围绕主题而编排，鼓点随表达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达到主体与鼓谱相互交融，相互支撑的良好效果，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2007 年 5 月，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定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末考生有多苦

考生们要蓬头垢面地参加几天几场的考试，其中的艰苦更是难以诉说——难怪人们对年过古稀还坚持奋战在考场上的举子要深表钦佩了。

南宋福建莆田人方翥，在绍兴八年(1138年)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异事。会试要考三场，方翥在第三场考试的时候，准备交卷了，突然发现脚边有个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张卷子，上面只写了本场考试的前三篇文章且文辞通顺。但是，方翥很不理解这个考生为什么不答完后面的题目就扔下考卷出场了。方翥自己答完了，觉得还有剩余的精力，就把捡到的这张卷子也帮他答完。答完后把自己的和他的卷子一同交了上去。此后，方翥也就忘了帮忙答卷的那个考生叫什么名字。后来方翥中了进士，在秘书省当正字。一次，他偶然想起了这件考场奇事，就和自己的几个同僚和宾客谈了。宾客当中有一个人和方翥是同年中的进士，听的时候默然无语。第二天，这名宾客穿戴整齐，非常隆重地来拜见方翥，说：“我当日考试的时候，突然身体不舒服，不能支撑，就摇摇晃晃地出去了，都不知道自己的试卷放在了什么地方。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满心绝望，谁想放榜时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榜上，恍然间还以为是跟我



同名同姓的。如果不是方大人这一席话，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恩人是谁呢。”这名宾客的运气真是好，遇到了像方翥这样既热心又有能力帮他答卷的考生。多数情况下考生在答卷的时候遇到天灾人祸，以致身体不支的时候就只能自己承担了。更糟糕的是，考场就是战场，考生和考生之间的倾轧、钩心斗角，让人更是心力俱疲。

来看些极端的考场悲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福建乡试时，由于天气酷热，考生中暑生病，头场就有四个人死在考场，第二场又有三个考生还没有考完就病死在号舍中。咸丰年间某次浙江乡试，一名山阴考生突然发疯。他不答题，只在试卷上题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黄土从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署名是“山阴胡细娘”。“胡细娘”回到寓所便死了。光绪十一年浙江乡试第二场即将开始的黎明，一个考生用小刀在自己的腹部猛划了十几下，被抬出了贡院。光绪壬寅科(1902年)浙江乡试，有的考生不堪忍受考场的巨大压力，直接在考场中自杀。“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于蛇，一以烛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那得是多么巨大的苦楚和压力，才让后两位考生选择了那般痛苦的死法啊!



毛泽东读书时 哪一门课 成绩只得 40 分

梁世佶老先生比较认可黄露生对他的岳父给毛泽东打 40 分的理解：其实，梁老的岳父对不喜数学和美术的毛泽东同样喜爱，尽管考试时，毛泽东只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仍然给了 40 分。

问毛主席的老师，请找第一师范黄露生

经常有人不远万里，来到第一师范打听毛主席的老师的事情。

就在 2011 年“五一”劳动节前，江西省萍乡市政协文史委的四五位同志，就找到第一师范退休教师黄露生，他们要打听的是江西萍乡籍、毛泽东的老师汤增璧。

毛泽东成为伟人的过程中，许多老师都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汗水，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张干等等众所周知，汤增璧是何许人也？黄露生说，这难不倒他。

他说，其实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写到

汤增璧，不过因湖南方言，“汤”、“唐”，音近，外人难分，所以《西行漫记》在翻译过程中，长期以来被错译成“姓唐的教员”。

斯诺《西行漫记》记录毛泽东的自述：“（在第一师范就读时）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周游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缘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动。我想效法，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这位姓唐的教员，无意中促成第二年夏天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湖南宁乡、安化一带游学，同时，姓“唐”的教员其实就是现在萍乡市政协文史委同志要找的“1914 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毛泽东国文课的教师汤增璧

先生。”

黄露生翻出毛泽东“一师”同班同学周世钊的《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指着一段话给我们看：“有一学期，班上来了一个姓汤的教员，他原来是在报馆当编辑的，讲课时能够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教给学生一点时事知识……毛泽东常于课余（在汤老师家交谈，有时毛泽东还帮他抱孩子）找他谈话，交换对时事的看法。”

这位汤增璧老师还真是一位人物。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交情甚厚，流传一时的孙中山《挽刘道一》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址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据说就是汤增璧先生代作，而辛亥革命志士刘道一的墓，就在岳麓山间。

1950年10月，毛泽东约见同学周世钊，曾反复问到1948年去世的汤老师，还委托周世钊打听汤先生的家人。但汤先生的后人却遵照父亲遗嘱，不给毛泽东添麻烦，始终没有露面。

直到1980年，曾亲昵地叫毛泽东“大哥哥”的汤增璧先生的儿子、青海师范学院教授汤钟琰先生，在毛主席去世数年后，为缅怀父亲高风亮节以及父亲与毛泽东的情谊，写信给湖南第一师范，请求证实其父与毛泽东的师生关系。

黄露生先生说，他找到了第一师范1980年8月5日“师办字第103号公函”。这封回函中写道：

青海师范学院汤钟琰教授：

来函收悉。经查旧日档案，你父汤增璧先生于1914年上学期至1914年下学期在一师任国文教员。其时，正值毛泽东同志第四师范转入第一师范，因此，周校长（指周世钊）及斯诺所记姓汤或姓“唐”的教师，即为汤增璧先生。是实。

黄露生说，汤钟琰先生接到此函，如喜从天降，立即抄写寄给兄弟子侄，多次带领亲人，不远万里，来到第一师范，瞻仰培养一代伟人的学校。

梁世佶的岳父，曾给毛泽东图画考试打40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心新中国的教育、关心新中国的教师，同时也感念旧日老师教诲之恩。

据黄露生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随后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但毛泽东仍将照顾老教师的想法率先垂范，先后用自己的稿费，招待、帮助、接济自己的老师，如黎锦熙、王季范、毛宇居、李漱清、张干、罗元琨、杨树达等先生，还有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贞常、启蒙老师邹春培先生之孙邹普勋、谭咏春先生之子谭世瑛、王正枢（即演员王人美的父亲）的孙儿等。新中国创立之初，公务员工资制度是“供给制”，为了照顾文教界“年纪大”而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和各省特设立文史馆，聘任这些老人，一边养老，一边发挥余热，实行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领导人国外演讲 有“门道”



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事出访过程中，演讲往往是传递信息、表达态度的重要手段，更是增进交流、促进友好的绝佳方式，也是领导人展现个人形象的舞台。而真正懂得其中“门道”的人，更是将其视为观察中国政治的绝佳窗口。

领导人出访演讲常去三个地方：名校、国会、欢迎宴。

毛泽东莫大赞青年 胡锦涛耶鲁忆母校

在中国领导人正式出访的行程中，大学演讲是很重要的一环，开启这个先例的人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一段寒暄之后，毛泽东摁灭了香烟，站起来走到台前，向在场的青年说道：“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此后数十年，中国领导人在各国著名大学做演讲愈发常见。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时在耶鲁大学做演讲，开篇就和大家分享40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并深情地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

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邓小平访美受超规格接待，国会为他开两次座谈会

1979年1月28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仅仅27天之后，邓小平就以副总理的身份踏上美利坚国土。而美国方面对于他的到来更是极其重视，除了没有按照国家元首规格鸣放礼炮外，一切接待都是按国家元首级标准进行的。

在公开演说方面，通常一个国家领导人到访美国国会一般只演讲一次，而这一次，美方则在国会参、众两院各准备一次座谈会。

后来在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美国各地100名参议员中有近90名参加，邓小平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朱镕基宴会谈笑风生征服美国政要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在美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了一番演讲。在驳斥美国报章所谓“政治捐款”“窃核机密”等诬蔑时，他说：“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个总理了，中国有1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几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那也太少啦！”总理举重若轻侃侃

而谈的话语,征服了美国主流社会政要名人。

领导人出访演讲功能各不同,但普遍“个性十足”

周恩来出访印度“舌战群儒”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境争端,周恩来冒险访问印度,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各路媒体刁钻且不怀好意的提问,并做了 45 分钟的讲演。

他在结尾时说:“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座的有不少是战神鸠摩罗的子孙,准备好了炮弹轰击我。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就应该发出来,我愿意承受。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他的儒雅的风度及雄辩的口才,让印度新闻界为之叹服。

江泽民是中国领导人“英语演讲第一人”

2000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联合举行的午餐会上,他用英语发表演说,博得了在场各界人士广泛的好评,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中美关系过去一年多经历的波折,尤其是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事情所导致的僵局。

而江泽民也成为中国领导人“英语演讲第一人”。

谋共赢:胡锦涛演讲连用 6 个“共赢”

2005 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 APEC 工商领导人高峰论坛邀请,在韩国釜山发表题为“树立开放思维实现合作共赢”的演讲。

短短 20 分钟的演讲中,胡锦涛共使用了 6 次“共赢”。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温家宝剑桥演讲处变不惊

2009 年 2 月 2 日,正在英国访问的温家

宝总理应邀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

演讲中,一男生突然吹起口哨并大声叫骂,并向温家宝扔出一只鞋子。作为堂堂一国总理,温家宝在台上坚定表示“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事后温家宝还以德报怨,希望校方给这名学生继续学习的机会。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让人期待

外媒称习近平口才了得将改变中国

在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展示了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的说话风格。

习近平 2009 年访问墨西哥时,对抨击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国家痛斥道:“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中央党校 2010 年举行春季学期开学典礼时,习近平仅用“长、空、假”三个字就指出了党内文件和演讲存在的问题。对此,有外媒称:“每当有文采的领导人掌权时,中国都会发生剧变。”习近平的言论如此吸引全球关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李克强演讲曾迷倒俄罗斯“90 后”

2012 年 4 月 28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俄罗斯访问时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

新华社消息称,“在演讲过程中有 7 次讲话被鼓掌所打断,掌声多达 20 余次。当天前来听演讲的学生们,大多属于俄罗斯的 90 后,他们思想自由独立,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当时,更有俄方人士称:“(李副总理的演讲)内容丰富,很打动人,而且是开放性的脱稿演讲,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诸葛亮斩马谡可谓是千古传诵。马谡的伏法归咎于他发的军法，马谡的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伏法。街亭一战对于蜀魏都至关重要，而且领军的人偏偏又是诸葛丞相十分赏识的人，因为当时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在危险中，为了安抚朝野上下，不得不用马谡的人头。诸葛亮此举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是却不唯一，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争霸天下。马谡被斩，是必然的，因为蜀国的势弱和他自身的重要性，这两点注定了他失了街亭被斩的必然性。

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 228 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他命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亲自率 10 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今甘肃)，任命参军马谡为前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

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并具体指示让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经过

马谡到达街亭后，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当时，副将王平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马谡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自信地说：“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得请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接着又洋洋自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致胜之秘诀。”王平再次谏阻：“如此布兵危险。”马谡见王平不服，便火冒三丈说：“丞相委任我为主

将，部队指挥我负全责。如若兵败，我甘愿革职斩首，绝不怨怒于你。”王平再次义正辞严：“我对主将负责，对丞相负责，对后主负责，对蜀国百姓负责。最后恳请你遵循丞相指令，依山傍水布兵。”马谡固执己见，将大军布于山上。

发展

魏明帝曹睿得知了蜀将马谡占领街亭，立即派骁勇善战，曾多次与蜀军交锋的张郃领兵抗击。张郃进军街亭，侦察到马谡舍水上山，心中大喜，立即挥兵切断水源，掐断粮道，将马谡部队围困于山上，然后纵火烧山。蜀军饥渴难忍，军心涣散，不战自乱。结果，张命令乘势进攻，蜀军大败。马谡失守街亭，战局骤变，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

原因

马谡违反了诸葛亮的调度，在山上扎营，是丢失街亭的主要原因，而街亭的丢失，让蜀汉军队丧失了继续进取陕西的最好时机，作为将领，马谡需要负主要责任。

诸葛亮斩马谡可谓是千古传诵。其实犯了军法的将领不一定就要处斩，比如唐时二路元帅薛丁山屡次犯军法，但却并没有被斩首示众。由此可见，马谡的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伏法。街亭一战对于蜀魏都至关重要，而且领军的人偏偏又是诸葛丞相十分赏识的人，倘若主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或许他可以逃过一死。因为当时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在危险中，虽然不是人心惶惶，但也有一些不安。诸葛亮为了安抚朝野上下，不得不用马谡的人头。诸葛亮此举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是却不唯一，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

争霸天下。诸葛亮这么做可以说是缓兵之计，为了整顿内务争取时间。其次，马谡的死与诸葛亮也有一定关系，至少是诸葛亮用人不明，导致整个形势急速扭转。诸葛亮为了做到令行禁止，不得不杀马谡来起到威慑作用，这样这一招可理解为杀鸡给猴看。马谡被斩，是必然的，因为蜀国的势弱和他自身的重要性，这两点注定了他失了街亭被斩的必然性。

结果

诸葛亮总结此战失利的教训，痛心地说：“用马谡错矣。”为了严肃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临刑前，马谡上书诸葛亮：“丞相待我亲如子，我待丞相敬如父。这次我违背节度，招致兵败，军令难容，丞相将我斩首，以诫后人，我罪有应得，死而无怨，只是恳望丞相以后能照顾好我一家妻儿老小。这样我死后也就放心了。”诸葛亮看罢，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要斩掉曾为自己十分器重赏识的将领，心若刀绞；但若违背军法，免他一死，又将失去众人之心，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于是，他强忍悲痛，让马谡放心去，自己将收其儿为义子。而后，全军将士无不为之震惊。

影响

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说道：马谡被推走了。诸葛亮拭干眼泪，又宣布一道命令：对力主良谋，临危不惧，英勇善战，化险为夷的副将王平加以褒奖，破格擢升为讨寇将军。善于自省的诸葛亮斩马谡，升王平之后，多次以用人不当为由，请求自贬三等，一品丞相为三品右将军，仍尽心竭力辅佐后主刘禅，欲图中原，成就大业。



揭开古代女子肚兜的秘密

有可考的穿内衣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那时的称谓是“褻衣”。“褻”意为“轻薄、不庄重”，因此即使洗干净了搁在那里也不能让人看见，否则是很失体统的。尤其是女性内衣，洗涤后绝对不能晾晒在外人可能经过的地方。大凡书中描写某女在人前露出内衣，那一定非良家女子。《红楼梦》中的尤三姐在与贾珍、贾琏饮酒时，“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一个在中国古人眼中坏女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内衣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称谓：汉朝内衣称为“抱腹”、“心衣”，魏晋称为“两当”，唐代称为“诃子”，宋代称为“抹胸”，元代称为“合欢襟”，明朝称为“主腰”，清朝称为“肚兜”，再后来就到了近代，则是我们至今仍可见到的“小马甲”了。

内衣称谓的变迁实际上表明了古代女人

对胸部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以唐代“诃子”为例，唐代对女性美早早喊出了“以胖为美”的口号，当然，这里的胖并非肥胖，而是丰满。这决定了美丽的女性不能像前朝人一样穿吊带的“心衣”，那样容易勒出毛病来。于是，唐代女人便发明了无带的内衣，称为“诃子”，她们将裙子高束在胸际，然后在胸下部系一阔带，两肩、上胸及后背袒露，外披透明罗纱，内衣若隐若现，因而内衣面料考究，色彩缤纷，难怪人们总以盛唐为骄傲，那时候便“内衣外穿”了。“诃子”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应该是以杨贵妃为分界线的。之前露胸较多，而后就有所收敛。蔡东藩《唐史演义》记载：“禄山与贵妃，鬼混了一年有余，甚至将贵妃胸乳抓伤。贵妃未免暗泣，因恐玄宗瞧破，遂作出一个诃子来，笼罩胸前。宫中未悉深情，反以为未肯露乳，多半仿效。禄山却暗中怀惧，不敢时常入宫。”由此可见，“遮丑”也是内衣的主要功能之一。

中国最早四位女留学生的故事（二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在遍布世界的中国学子当中,不乏女性的身影。然而,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尽管当时已西风东渐,但女子们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垂手伫立在男人的身后,至于出洋留学,那简直是传奇中的传奇。

在当时的中国,偏偏就有四位年轻的女子大胆地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天足,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最后还都做了报效祖国的女“海归”,以所学救助同胞,服务社会。

这四位女子分别是金雅妹、许金匄、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出国的时间是 1881 年至 1892 年之间,那会儿甲午战争还没打响,大批留日留美的中国学生还没出发。所以,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

她们本是普通的中国女子,却有着不同常人的经历。传奇或许不可复制,但她们的故事值得我们记取。

康爱德:梁启超盛赞的女学先锋

前文提到,北洋女医院因天津海关停止拨款而面临关门,幸而由教育家严范孙出手接办。而接替金雅妹担任院长之职的也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留学生,她的名字叫康爱德(又名康成)。

康爱德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1873 年 12 月 6 日出生于江西九



Dr. Ida Kahn

康爱德

●文史拾趣●

江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此时的家中已经有了五个女孩，新生命的降临并没有给期盼能有一个男孩的父母带来喜悦，她被送给邻家做童养媳。邻家请了算命先生给她算命，不料算出来的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命犯天狗，婚姻不利，邻家自然不敢接收她。正当家人无计可施之时，一位给西方传教士做中文教师的乡邻建议康爱德的父母，将她送给他所教的那位女传教士收养。就这样，在这位乡邻的说合下，美国海外布道会传教士霍格女士(Mrs. Hoag)收养了这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女婴，并给她取了个英文名字 Ida Kahn。

从此，小康爱德在霍格女士与她的同事昊格矩女士(Jenny Hughes)的身边一天天长大，走上了一条迥异于中国平民女子的人生道路，不知是否应该感谢那位算命先生的八卦图？

9岁时，霍格女士因事回美国，就把小康爱德带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她学会了英语。后来她又回到中国，跟着昊格矩女士在重庆生活了两年。1886年，重庆发生了反教运动，教会大院被夷为平地，传教士们躲往总督衙门，康爱德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躲藏了两个月，随后她们找机会逃出了重庆。当时正值春天冰雪融化，三峡的江水很急，沿江的低洼地带都被洪水淹没，使得这场“逃亡”之旅充满了风险。13岁的康爱德坐着小船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长江，她的人生又一次化险为夷。

在日本避难几个月后，这几位勇敢的女子安全返回九江。1892年，昊格矩女士带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回到美国。这两个女孩便是康爱德和她在九江教会女塾念书时的同学石美玉。她俩都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在学校，包括拉丁

语在内的各项考试她们都名列前茅，还交了许多朋友。

在毕业前举行的一场互赠礼物的聚会上，她们得到了很多在中国行医时用得上的设备。在毕业仪式上，两个女孩穿着中国旗袍登台领取毕业证书，康爱德的旗袍是蓝色的，石美玉的是粉红色。礼堂里人们长时间地为她们起立鼓掌，学校教员们也起立向她们致敬。校长还当众称赞康爱德：“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与吾美之女作比例，愧无地矣！”（引自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一文）。

毕业后，她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芝加哥的医院实习并接触了一些著名的医生。1896年，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国，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国人热烈的欢迎，在九江码头上岸时，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们都好奇地想看看这两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女医生。三天后，她们开始参观当地的医院并应要求临时做了几台手术，也向国人表明，她们确实懂得医术。

她们在九江的行医很顺利，甚至在九江之外也颇有名气。张之洞曾写信给昊格矩，恳请派康爱德和石美玉去上海执教他正在创办的医学师范学校，并承诺容许她们私下进行宗教活动。张之洞的邀请在随后的妇女卫理公派教徒会议上引发热议，康爱德和石美玉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因为她们觉得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统计，到她们行医的第二年末为止，她们在医务室接诊90人，在自己家中接诊134人，门诊病人大约3973人，去乡下看病1294人，合计治疗5491人。病人数量逐年上升，所有的收入被移交给教会财政部门。她们用四

年的行医来补偿在美国上学四年的费用。

一次,南昌巡抚派了一艘船到九江,请求她们派一位医生去为他的夫人看病。康爱德立即出发,并将患者带回九江悉心照料。巡抚夫人完全康复回到南昌之后,广为宣传这两位女医生。康爱德借此机会,到南昌设立医院。她的医院逐步扩展,1907年一年就收诊病人8000多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她的医院收治了大量受伤的难民。

1899年,作为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女知识分子,康爱德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妇女协会会议,她是继许金匄之后的第二位国际女代表。

1896年,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文,极力赞颂康爱德的成就,算是他鼓吹女学的第一篇宣言。孰料还由此引出了一条花边新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读到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不禁为之神往,并且从《申报》的报道中得知她“尚待字闺中”,于是托罗振玉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人”,想要和她结为连理。

1907年后,34岁的康爱德再次负笈海外,先后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在英国的热带病院深造医学。四年后回南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直至1931年去世。

·解字·

“内”



①



②



③



④

“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这个“内”字本为会意字。①是甲骨文的形体,上为“屋”,下为“人”,入屋为“内”。②是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相似。③是小篆的形体。④为楷书写法。

《说文》:“内,入也。”桂馥认为:“凡自外入为内,所入之处亦为内。”入内即为“纳”,所以“内”字的本义为“纳”,读作 na,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是说:老百姓若能交纳一千石粮食,就升官一级。

“内”由本义“纳”可以引申为“里面”,表方位,与“外”相对,读作 nei。如《广雅,释言》:“内,里也。”《仪礼·士昏礼》:“主妇阖扉(关门),立于其内。”由“里面”可以引申为“内室”,如《汉书·晁错传》:“家有一堂二内。”这里的“二内”,就是指两个内室。因为妻、妾多居内室,所以“内”字有时也指“妻”、“妾”,如《西游记》第六十回:“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原来是个惧内的庸夫!由“妻”、“妾”义又可以引申为“女色”,如《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好内。”这是说:齐侯贪于女色。

心在胸内,所以有时“内”也指“内心”,如白居易《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我为同州牧,内愧无才术。”“内愧”,正如今之言“内疚”。

省地方志办主任 张仁华到市地方志办调研

5月23日上午，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仁华带队到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实地查看了市志处、年鉴处、地情资料处等处室并召开了座谈会。

在听取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对我市地方志工作情况所作的简要汇报后，张仁华主任对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是市志办近两年围绕中心工作，业务开展卓有成效，出版的系列丛书，格调厚重，颜色清爽，富有文化气息，值得全省各地市学习借鉴。二是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管理良好，整个单位充满活力。尤其是不等不靠，积极协调，内部抽调人员补充二轮修志的做法值得学习。三是对市志办与完成二轮修志工作的单位协调启动三轮修志工作的做法表示赞赏。

同时，张仁华主任也对市志办反映的问题表示高度关注：一是如何加强区县修志机构和保持修志人员的稳定性的问题。中央早就强调修志工作要做到“一纳入五到位”，但是部分区县和单位迟迟没有做到，对修志工作带来很大影响。二是部分二轮修志完成较早的单位其机构和人员如何保留，如何做好与三轮修志的对接。三是图书出版方面能否出台一个规范性文件，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以提高撰稿人的积极性。

此外，调研组在深入了解我市地情资料和信息化建设情况后，就地情网站图书的版权和防盗版等网络安全问题与市地方志办公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对于西安市地方志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张仁华主任表示将会通过调研探索可行的办法解决。

《雁塔区志》通过复审

《雁塔区志》复审会于5月17日在雁塔区召开。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纪检组长任昆明、副主任张帜，雁塔区委副书记刘伯雅，《雁塔区志》复审组成员及该志全体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议。

《雁塔区志》上限1994年，下迄2010年，

全书共37个分志，约120万字，由雁塔区地方志编委会人员历时10年含辛茹苦而成，于2012年11月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复审。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雁塔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雁塔区志》复审组认为，该志稿政治观

点正确、层次结构合理、资料丰富翔实、时代特征鲜明、文字通顺流畅,整体已接近成熟。复审组同时就志稿在体例结构、内容记述、行文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代表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布《雁塔区志》通过复审,同时要求《雁塔区志》编纂人员认真梳理审稿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和措施,确保年内报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终审。

市地方志办公室 以推进区县二轮修志工作为抓手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4月23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由冯艳阳主任带队,利用参加《长安区志·旅游篇》志稿研讨会的机会,赴长安区开展第二轮区县志编纂工作调研活动。

参加研讨会之前,冯艳阳主任一行专门约见了长安区区长、区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杨建强及分管地方志工作的副区长,双方交换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长安区地方志工作的想法和意见。

在调研中,市志办通过“听、问、走、看”等方式,深入了解修志一线基本情况。一是听取了第二轮《长安区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旅游篇》篇目设置、资料收集、编纂、篇目特色等情况。二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修志人员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对市志办工作的意见、建议。三是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对我市一线修志人员工作现状有了更好的掌握。

研讨会上,长安区志办有关同志分别就全区地方志工作的总体情况及第二轮《长安区志》编纂情况进行了汇报,分析了当前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加快地方志工作全面发展、着力打造精品志书的明确思路。随后,与会的省、市专家及区志有关编修人员围绕《长安区志·旅游篇》初稿进行了研讨。

冯艳阳主任在讲话中指出,长安区的地方志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二轮《长安区志》和《长安年鉴》编修工作的全面启动,地方志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开,使得方志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成果斐然。召开《旅游篇》初稿撰写研讨会这种形式非常好,各位专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初稿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初稿的修改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这种以会代培的方式也有效地提高了全体区志编纂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志书其他分篇的总纂工作指明了方向。二轮修志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市地方志办公室将以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区县修志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确保按照省、市政府的统一要求,于2015年全面完成全市第二轮修志工作。

“株连九族”指哪九族

九族是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九个辈分当中同辈的也包括，若是诛十族则包括了门生。

说法一：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1.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2.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3.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说法二：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少康中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除之

不尽的后果，吴子胥与吴伐楚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开始有「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代越来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印象中，老师说的是第二种说法，而十族则是加了犯人的师生一族。另外，在辞典又看到另一种说法。九族：九代的直系亲属，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夷九族：代对于谋反等叛逆重罪所施的刑罚，自高祖以至玄孙，皆连坐诛灭。大概这些说法皆有，就视君王采用何种说法了。

“囊中羞涩”是一种善举

杜甫写有《空囊》一诗：“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这首诗写尽了诗人生活艰难的窘境。其中“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囊中羞涩”，也写作“阮囊羞涩”。杜甫如此贫穷，应该叫“杜囊羞涩”才对，为什么叫“阮囊羞涩”呢？此典出自元人阴时夫所撰《韵府群玉》一书。在“七阳”一章中，阴时夫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阮孚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阮曰：‘但有一钱看囊，空恐羞涩。’”阮孚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布囊，在会稽一带游历，有人问他：“您的囊中盛的是什么宝贝啊？”阮孚回答

道：“我的囊中只有一枚钱，恐怕囊羞涩，用它来看囊。”原来“囊中羞涩”不是指主人因囊中的钱少而羞涩，而是主人好心，不想“囊”因为没钱而羞涩，阮孚才用一枚钱压着囊底，给“囊”以安慰。“囊中羞涩”绝非讲阮孚贫困。阮孚是晋朝人，一生都在做官，而且还都是高官。阮孚喜欢饮酒，史载他曾经“以金貂换酒”，阮孚49岁死前的官衔是“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镇南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可见说他“阮囊羞涩”乃是后人伪造的故事。

一个富人留下贫穷的名声，而且还成了典故，被后人屡屡引用，这在历史上大概不多见吧。

「五雷轰顶」的 「五雷」是指什么？



在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时，人们往往喜欢用成语“五雷轰顶”来形容。但其中的“五雷”指的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首先须搞明白一个古代盛行的学术概念：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五行学说最早出现在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学说中。它强调整体概念，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如果说阴阳是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原始的普通系统论。五行学说作为我国古代的物质组成学说，与西方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学说类似，包含着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

“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的《甘誓》与《洪范》中，在《甘誓》中有“有扈氏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这样的句子，点出了“五行”这个词。《洪范》中则指出“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雷轰顶”中的“五”指的就是五行，代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因此，“五雷”就是金雷、木雷、水雷、火雷、土雷的合称。金雷指刀剑、金属、铁器、车祸等。木雷指棍棒、高处摔下、树木压住等。水雷指溺水、水淹、在行走中出意外、生病等。火雷指火烧、电击、雷击等。土雷指土埋、房屋倒塌、高处掉物等。古人还认为，被此五雷击倒者必定是罪孽深重的人。

“五雷轰顶”又作“天打五雷轰”，其另一层意思是告诫人们别作恶，如干了伤天害理的坏事后，一定会遭到上天各种形式的惩罚。

“孔方兄” 称谓的来历



说法一

我国的钱有“孔方兄”之称，那么我国为什么有称钱为“孔方兄”的说法呢？其原因是由于我国古代使用的是铜钱，它是一种辅币，一千个为一贯。铜钱是圆的，中间却有一个方孔儿。铜钱所以这个形状，是由铸造方法决定的。过去，熔铜铸钱，钱的轮廓总不整齐，必须用锉刀修锉。一枚铜钱锉一次很费工，于是便在铜钱中间开一个方孔，将一百来个铜钱穿在一根棍子上一起锉，如果当中的孔是圆的，锉起来会转动。所以，又有“孔方兄”之称，以后就泛指所有钱为“孔方兄”了。亦称“孔方”。即钱，中国旧时铜钱外圆内孔方形，故称（鄙视意，谐称）。

为什么称“钱”为“孔方兄”而不称“孔方弟”或“孔方叔”呢？据说宋朝大诗人黄庭坚因得罪了朝廷被降职，他的亲友们便渐渐与他疏远起来，他很伤心，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诗意是我被降职后，只有笔墨相随（“管城子”是笔的别称），只有笔墨无庸俗相，不像有些人都不愿和我来往了；而钱，更与我绝交了。由于此诗的广泛流传，“孔方兄”就这样成了“钱”的代名词。

说法二

惠帝元康(291~299)年间，纲纪大坏，世

风日下。惠帝昏聩无知，朝纲旁落，政出多门，依法贿赂成风，很多人都贪得无厌。“竹林七贤”中的王戎，积累的钱无法计算，经常手持算具，昼夜计算，仍觉不够。他的弟弟王衍之妻郭氏，也是聚敛无厌的人，曾用钱来环绕床沿。驸马王济用铜钱做院墙，围成跑马射箭场，当时的人称之为“金埒”。太子少傅和峤，以“钱癖”著称。“惟钱是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针对这种社会现状，鲁褒作《钱神论》以讥讽世风。《钱神论》说：钱之为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还说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无耳，可使鬼”。《钱神论》尖锐地讽刺了钱能通神使鬼，主宰一切的作用。这篇文章一出，立即引起了愤世嫉俗的人们的共鸣，被广泛传诵。“孔方兄”一词，也成为了“钱”的同义语。

说法三

孔方兄：古钱币的别称，又称“孔方”、“家兄”，古人把一百来个半成品铜钱穿在一根棍子上修锉外沿，圆棍穿钱，修锉时来回转动，方棍穿钱，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于是铜钱中间有了方孔。钱为何称“兄”？钱字由

“金、戈、戈”组成，“戈”“哥”音同，于是“称兄道弟”。

相传当初铸造货币时，是加进了孔老夫子的理念。孔夫子认为做人要正直、规矩、原则，并提出了“方正君子”的思想，所以铜钱就被铸成外圆内方之状。意思是：做生意的人虽然外表不得不圆滑，但内心则一定要方正，即遵守道德。于是，孔方兄不仅成为对钱最形象生动的称呼，而且还寓意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做人的理念。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孔方兄把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面对金钱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心态从称呼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它成为不喊出“钱”字来的钱的最巧妙而又抬举人格的代名词。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



“筷子”称谓的起源

“筷子”这个名称很有意思，本来不是官方的正式称谓，到今天却变本加厉地演变成了唯一的称谓。

筷子的起源很早，不过最早叫“挟”或“箸”。《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羹不是今天认为的汤，而是指用肉或菜调和五味做成的带汁的食物。《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殷纣王制作了一双象牙箸，忠臣箕子看到后很惊惧，他认为殷纣王有了象牙箸就会思谋犀玉杯，有了象牙箸和犀玉杯后当然就不可能用这两样珍贵的食具吃普通饭菜了，必然追求牦牛、象和豹胎等美味；能够吃到这些美味，当然也就不可能节衣缩食；住在茅屋里，那么紧接着就会追求锦衣高台，必然要搜刮民脂民膏，为祸百姓。“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最终不幸被他所言中。

“箸”就是“箸”，为什么又叫“筷子”呢？这个称谓起自明代，明人陆容所著《菽园杂记》一书记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庄’，讳‘翻’，以‘箸’为‘快儿’。”原来，“箸”和“快”同音，船家最怕船抛锚停住，因此改称“箸”为“快儿”，意为让船快行。这是一种讨口彩、图吉利的常见现象，各地方言中都有类似的忌讳。明人李豫亨在《推蓬寤语》一书中说得更加明白：“世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已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日本人没有这种忌讳，因此日本现在把筷子叫作“箸”。筷子乃竹木所制，久而久之，后人就把“快”加了个竹字头，称作“筷子”了。

虽然开始官方并不承认“筷子”的叫法，比如《康熙字典》中居然没有收入“筷”这个字，但是民间流传的速度实在太快，影响实在太太大，至清代已经广泛使用这个称谓了。



「楚河汉界」指的是什么地方

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横亘着一条大河，“河中”一般都会写有“楚河汉界”四个大字。所谓“楚河汉界”，即是源于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据《史记》记载：“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也就是说，鸿沟就是楚河汉界。“楚河汉界”究竟在哪里呢？

据记载，历史上的楚河汉界，是在古代豫州荥阳成皋一带，它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平原，南接嵩山，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 205 年夏，项羽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大败汉军，刘邦退到荥阳。此后，楚汉两军在荥阳一带互相攻伐长达两年之久。公元前 203 年，刘邦出兵攻打楚国的成皋，守将曹咎经不起刘邦军士多次到城下叫阵谩骂，怒而率部出城，欲渡过汜水与汉军作战。当船至河中时，遭到汉军突袭而败，曹咎后悔不迭，自知无颜去见项羽，遂自杀而亡。刘

邦顺利攻取了成皋，屯兵广武。项羽得知成皋失守后，立即调兵前往救援。为了迫使刘邦投降，项羽据城东把俘虏来的刘邦的父亲拉至广武山（今霸王城）上，隔涧要挟刘邦说：“你若不及早投降，我就把你父亲下锅煮死。”刘邦却故作镇静地说，“当初咱二人共同反秦，盟誓结为弟兄，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煮咱们的父亲，别忘了给我一碗肉汤”。项羽听后更加恼怒，决定杀掉刘太公。在项伯的力劝之下，“太公幸存”。但刘邦闭城不出，并派大将韩信率兵抄了楚军的后路，占领了河北、山东一带。项羽因为粮缺兵乏，不得不被迫提出“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的要求，历史就这样使鸿沟成了“楚河汉界”。

如今，在河南荥阳城东北的广武山上，还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是当年刘邦、项羽所筑。两城中间有一条宽约 300 米的大沟，这就是刘邦与项羽对垒的鸿沟。

那么，象棋里的楚河汉界有什么人文意义呢？两军对垒的时候，中间隔着一个“楚河汉界”，敌我双方分为黑红，为“九五”而战，战局中“斗智不斗力”，通力擒拿敌军的将帅，但将帅并不照面……中国象棋对弈中的这些“规则”，所沿袭的或许正是楚汉之战的文化底蕴。

『飞黄腾达』的『飞黄』 指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成语“飞黄腾达”是比喻人骤然得志后发财致富，或者官运亨通地位迅速攀升。但是仔细推敲一下的话，“飞”和“腾达”似可意会，“黄”作何解呢？有人于是臆测，“飞黄”嘛，当然就是飞来金灿灿的黄金啊！

这是生搬硬套胡猜乱造了！“飞黄”两字是一个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它是古代传说中一匹神马的名字呢。这匹“飞黄”宝驹四蹄生风，常可疾驰如飞“腾达”而起。“腾”是高高跳起，“达”是通畅达至，“飞黄腾达”则是说飞黄骏马疾驰奔腾，跳跃升空之意。人们喜欢用“飞黄腾达”比喻快速升官发财，当然是十分生动形象了。

韩愈有一首《符读书城南》诗作，其中写

道：“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应是成语“飞黄腾达”源头。原诗意思是说，飞黄神马腾踏而去，决不会顾及路边那只无足轻重的癞蛤蟆（即“蟾蜍”），如何反应了。后人撇开了“不能顾蟾蜍”，又以“飞黄腾达”代替了“飞黄腾踏”。

可见，常用的成语“飞黄腾达”，原来语义包含有不理小人之见，不顾他人如何反应的内涵，大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藐视小人傲看世界的风发气概呢！但是，现在此成语的准确讲解，已经单纯指迅速发财或骤然升官了，不再包含丝毫“不能顾蟾蜍”意思了。



日本和服的起源

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因为日本人口中的 90% 以上，都属于“大和”民族，故取其名，在日语中，它又叫做“着物”。和服除了保暖、护体外，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女性和服色彩艳丽，式样美观，腰部还配有漂亮的宽幅带子，简直就是一种艺术品。

和服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 3 世纪左右，据《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这便是和服的雏形了。大和时代，倭王曾三次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带回大批汉织，吴织以及擅长纺织、缝纫技术的工匠，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移民中也大多是文人和手工艺者，他们将中国的服饰风格传入日本。

奈良时代（公元 718 年），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受到唐王的接见，获赠大量朝服。这批服饰光彩夺目，在日本大受欢迎，当时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次年，天皇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全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

到了 14 世纪的室町时代，按照日本的传

统习惯和审美情趣，带有隋唐服装特色的服装逐渐演变并最终定型，在其后 600 多年中再没有较大的变动。至于腰包则是日本妇女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穿长袍系腰带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开始腰包在前面，后来移到了后面。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都穿和服，但在明治维新之后，上层社会中的男士开始流行穿西服，也就是俗称的“洋服”。

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由于当时的妇女仍穿和服，故因行动不便而遭遇不幸或身留残伤。此后，日本妇女才逐渐改穿套裙或其他服装。不过和服在今天仍是日本人的最爱，无论是在节日庆典、毕业典礼、婚礼、葬礼或是在庆祝儿童的“七五三”等重大场合之上，随处可见身着传统和服的人们。

和服的两个袖子在左肩上打结，腰间用别针固定，下排开衩是一种新设计的无袖和服。使布面起立体皱纹的直线式和服。在长衬衣外披上和服并用别针固定腰部，行动起来两袖轻盈飘逸。

少年游

◎

(宋)柳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
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作品赏析

这首小词以深秋的长安为背景，触目伤怀，抒发了词人“秋士易感”的矢志之悲和离愁别恨。全词不事雕琢，采用白描手法，营造出一种低沉萧瑟而又冲淡清丽的意境。

开端的“长安”可以有写实与托喻两重含义。就写实而言，柳永确曾到过陕西的长安，在另一首《少年游》中，他写过“参差烟树灞陵桥”之类的句子。

再就托喻言，“长安”原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古都，诗人往往以“长安”借指为首都所在地，而长安道上来往的车马，便也往往被借指为对于名利禄位的争逐。柳永此词在“马”字之下接上“迟迟”两字，这便与前面的“长安

道”所可能引起的争逐的联想，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衬。至于在“道”字上著以一“古”字，则又可以使人联想及在此长安道上的车马之奔驰，原是自古而然，因而遂又可产生无限沧桑之感。总之，“长安古道马迟迟”一句意蕴深远，既表现了词人对争逐之事早已心灰意冷，也表现了一种对今古沧桑的深沉感慨。

“高柳乱蝉嘶”一句，写秋蝉之嘶鸣更独具有一种凄凉之致，也表现有一种时节变易、萧瑟惊秋的哀感。柳永在“蝉嘶”之上，还加了一个“乱”字，如此便不仅表现了蝉声的缭乱众多，也表现了被蝉嘶而引起哀感的词人之心情的缭乱纷纭。至于“高柳”二字，则一则表示了蝉嘶所在之地，再则又以“高”字表现了“柳”之零落萧疏，是其低垂的浓枝密叶已凋零，所以乃弥见树之“高”也。这一句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凄凉萧索。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三句，写词人在秋日郊野所见之萧瑟凄凉的景

●历代诗人咏长安●

象，“夕阳鸟外”一句足可以表现郊原之辽阔无垠。飞鸟隐没在长空之外，而夕阳隐没则更在飞鸟之外，所以说“夕阳鸟外”。值此日暮之时，郊原上寒风四起，故又曰“秋风原上”，此景此情之中，一失志落拓之词人，又将何所归何处呢？“目断四天垂”，只见天苍苍，野茫茫，双目望断而终无一归处。上阕是词人自写今日之飘零落拓，望断念绝，自外界之景象着笔，感慨极深。

下阕，开始写对于过去的追思，感慨一切希望与欢乐已复得。“归云一去无踪迹”一句，是对一切消逝不可复返之事物的一种象喻。柳词此句之喻托，则其口气实与下句之“何处是前期”直接贯注。所谓“前期”者，指的是旧日之志意心期和旧日的欢爱约期。对于柳永而言，这两种期待和愿望，都已经同样落空了。下面三句乃直写自己今日的寂寥落寞，“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早年失

意之时的“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的狎玩之兴，既已经冷落荒疏，而当日与他在一起歌酒流连的“狂朋怪侣”也都已老大凋零。志意无成，年华一往，于是便只剩下了“不似少年时”的悲哀和叹息。这一句“少年时”气脉贯注，富于伤今感昔的慨叹，叹的是所追怀眷念的往事已无迹可循。以“归云”为喻象，写一切期望之落空，最后三句以悲叹自己之落拓无成作结。全词情景相生，虚实互应，是一首艺术造诣极高的好词，也是柳永悲剧性人生的缩影。作为一个禀赋有浪漫之天性及谱写俗曲之才能的青年人，命中注定了是一个充满矛盾不被接纳的悲剧人物。这首词不仅形象地描绘出高柳乱蝉、夕阳秋原的凄凉之景，而且更寄寓着作者浓重的离愁别恨和沉痛的身世之感。通篇采用白描手法，语言朴素，意境淡远。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此词都对宋词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名句欣赏·

【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序》

专：只看某一方面。

【好德乐善而无求】——《吴学士转官》

好：喜爱。乐善：乐于为善。无求：没有过分的要求。

【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道德》

至：最。

【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惧】——《德威堂铭》

德：德行。威：威势。明：英明。察：觉察。

【德与才不同，虽古人鲜能兼之】——《牛李》

鲜：很少。兼：都具备。